Co-China 周刊

NO. 159
2014年 6月20日

黄姜片等：马云许家印们的足球政治 | 克韩谈世界杯、足球与政治 |
《经济学人》：足球虽美球界不堪入目



编者的话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终于又来了。体育比赛给我们带来纯粹的快乐，但是世界杯本身却并不纯洁。作为一项影响力巨大的体育赛事，世界杯有超越足球本身的作用与意义，这也使得从申办世界杯到世界杯赛都充斥着试图操控足球的人的影子。

世界杯的历史上，权力之手如影随形。在第二届世界杯上，墨索里尼就曾“劝服”希腊队退出与意大利的第二轮较量，保证了意大利队直接晋级。而在第十一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当时的阿根廷军政府为了保证对阵秘鲁的那场关键比赛的胜利，用金钱买通了秘鲁球员，最终使得阿根廷人捧起了世界杯。

如今，虽然不太可能有独裁者以政治手段操控足球比赛的结果，但足球与政治的联盟仍然是惯象。一方面，足球仍然是拉拢民众的有力工具，过去 20 年叱咤意大利政坛的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以足球场上的一句口号来命名他的政党；遭罢黜的泰国总理他信·西那瓦，曾选择通过收购曼城队来博得国内关注。另一方面，资本也在通过足球接近权力。在中国，马云许家印们与足球的主动联姻昭示着足球这张不可多得的名片有助于资本大佬们构筑起自身强有力的社会资本，“投资足球，可以得到更多潜在的高层支持。而这种支持，对于房企拿地、授信等层面，起到巨大的作用”。正如克韩在与郑诗亮的访谈中提到的，当亿万人都对一项运动关切时，它就已经不仅仅是运动了。巨大的商业和政治利益使得足球世界常常难以独善其身。

正是为了维护和保证足球比赛的纯粹性，足球协会组织应运而生。国际足联明文规定禁止一个国家的政府部门干涉该国的足球事务，以保证足球的纯洁。但事实上，以“for the good of the game”为口号的国际足联本身深陷贿选、作弊假球等丑闻中。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就曾披露卡塔尔通过贿选获得了 2022 年世界杯主办权。《国际足联为何对政府说不》一文认为，这种攫取到手的巨大利益是作为“超国家主体”的国际足联面对各国政府不断强势的重要动机。《经济学人》的报道则分析了国际足联腐败不堪背后的制度原因：有资格对国际足联进行监管的国际或区域性足球组织都需要依靠它的资金；由于行业准入门槛高，出现竞争机构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国际足联对国际足球运动拥有先天的垄

断，像这样的机构理应受到约束，但国际足联却对监管说不。而反观中国足协，官商一体的运行模式诞生了最坏的市场化和最无效的管制，市场化的中国足球一步步走向溃败。

这真是糟糕的消息，当政治的触角迫切想要伸入搅动足球的世界，而本应保护足球不受外界干扰的足联组织本身又腐朽不堪，谁来保证足球的纯洁？周刊的最后我们尝试提出可能的方案。正如《足球溃败的警示》一文所说，本质上讲，足球不过是一项游戏，如果我们连这项游戏都玩不好，没有办法为其设计一整套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并有效捍卫，遑论其他。



目录














【观】

刘火雄：墨索里尼：不夺冠，便去死

《文史参考》撰稿人

“

为了让决赛不再发生“意外”，拥有指定裁判权的墨索里尼，选择了丹麦裁判埃克伦德执法意大利队参加的半决赛和决赛，事后传言埃克伦德曾被墨索里尼召至包厢，并命令他在有争议的时候必须作出对意大利队有利的裁决，以白色恐怖压迫裁判，可谓开假球黑哨之先河。

”

自 1930 年首届世界杯足球赛在南美洲乌拉圭举办以来，意大利在获得 2006 年世界杯冠军后，已先后 4 次折桂，仅次于巴西的 5 次问鼎。由于上世纪 30 年代的两次夺冠，都与独裁者墨索里尼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干系，以致今日许多人仍认为意大利胜之不武。

墨索里尼向来是意甲拉齐奥队的支持者，时不时会带儿子一同去观战。这支以罗马所在的拉齐奥大区区名命名的球队，其创立者是一名军人。百余年前俱乐部刚刚成立的时候，他们的球场是一个军事阅兵场地。由于这个传统，拉齐奥一跃成为墨索里尼最钟爱的球队。1931 年，拉齐奥离开了罗迪内拉体育场，搬入罗马奥林匹克球场。这个豪华的球场是墨索里尼为申办世界杯准备的，能容纳 8 万人的看台到今天都不过时。当时的球场充满了法西斯气息，四周粉刷着类似于“越多敌人，越多荣誉”之类的标语。

墨索里尼希望拉齐奥能称雄意甲，拉齐奥却成了扶不起的阿斗。在墨索里尼执政的 22 个赛季里，拉齐奥没有获得一次联赛冠军，上世纪 30 年代，球队始终徘徊在降级区边缘。好在世界杯给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主义提供了一个新舞台，足球却因独裁而“失身”。

国际足联要钱，墨索里尼要脸

1932 年，当斯德哥尔摩像迎接国王一样迎接了国际足联大会的参加者，威尼斯也别有用心地在客人们房间的阳台上放满了葡萄酒，他们都以为自己会成为举办 1934 年世界杯的风云之城。



由于饱受席卷欧美的经济危机的影响，捉襟见肘的国际足联，更多地把收入问题摆在了首位。意大利许诺将世界杯放在罗马、都灵、米兰、那不勒斯等城市，关键是承诺跟国际足联分红。

意大利这个拒绝参加第一届世界杯的国家，此时如此卖力地争取举办权，是墨索里尼经过精打细算后的结果——此时的意大利国内正处在全世界经济危机的煎熬中，他看准了主办世界杯一方面可以分散国人的注意力、增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机显示他所谓“大罗马帝国”的团结、强大和法西斯主义的无往不胜。他信誓旦旦地向国际足联表示：将不惜一切代价，举办一个让全世界为之忌妒的足球盛会。

同时，随着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柏林——罗马”军事政治轴心的显形，法西斯领袖正试图今天征服本国，明天称霸全球。鉴于当时欧洲大陆普遍采取的绥靖政策，最终国际足联经过长达 8 个月的委员会会议，力排众议将第二届世界杯的主办权送给了墨索里尼。

打造“南美意大利队”

墨索里尼几乎包办了比赛的所有组织工作，以实现其把世界杯变为宣扬法西斯主义工具的初衷，借此重温罗马帝国辉煌，鼓吹大国崛起。

为了体现民族特性，强化当时的国家与种族主义意识，这位独裁者不但为意大利足球创造了“Calcio（足球）”和“Tifoso（球迷）”两个专有词汇，还特意设计了蓝色球衣。此前，意大利队的球衣颜色一直以白色为主。墨索里尼觉得，意大利人更偏爱天蓝色，意大利男士西服里配的往往都是天蓝色衬衫。这也是后来人们习惯把意大利国家队称作“蓝衣军团”的缘由。

在某种程度上，1934 年世界杯对于意大利而言，更是一场外籍人的赛事。当时，意大利队虽然有国际米兰出身的梅阿查等国际巨星，可是并没有绝对实力击败西班牙、奥地利、德国这样的强队。

为确保夺冠，墨索里尼命令在全世界搜罗顶级足球选手，他认为种族归属可以决定球技高低。意大利当局在那些优秀运动员的家谱里寻找“高贵”的意大利血缘，只要与意大利移民沾上边，便被拉入意大利队，成为“雇佣军”。个别选手没有这种血缘，当局便修改其国籍，让他们代表意大利参赛。

随着阿根廷队奥西、蒙蒂等一流球员的加盟，意大利队更像是一支临时组建的“南美意大利队”。如蒙蒂曾代表阿根廷获得了首届世界杯亚军，加入意大利后，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代表两个国家参加世界杯决赛的球员。同时，墨索里尼将意大利队的球员秘密集中在山里训练，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此举开长期封闭集训之先河。



万事俱备，球迷却成了一个问题。就在大赛开幕前两天，门票一直卖不出去。墨索里尼于是亲自去买票，并命令各大报刊都刊登一张他买票的照片。这名记者出身的独裁者显然非常熟悉媒体的功效，第二天果然就有数万名意大利人学他的样子前往购票。此后，凡有意大利参加的比赛，看台都座无虚席，人声鼎沸，门票也总是提前被抢购一空。看台被球迷塞满的现象让全世界都相信：足球是最热门的体育项目，罗马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法西斯式敬礼亮相世界杯

由于在乌拉圭首届世界杯上欧洲多数国家拒绝派队参赛，到了 1934 年，乌拉圭以同样的方式予以报复，使得这届世界杯第一次没有卫冕冠军出战。

尽管如此，依然有 31 支球队参加了墨索里尼一手主导的世界杯，数量上远超出首届参赛的 13 支。由于参赛球队较多，国际足联决定不设小组赛，全部采取淘汰赛制。巴西队和阿根廷队不远万里而来，但由于没有派出最佳选手，结果只踢了 90 分钟的淘汰赛，便分别输给了西班牙和瑞典队，然后只得落寞而归，引得国内民怨纷纷。

更出人意料的是，国际足联竟然要意大利队参加预选赛，不能自动进入后续阶段比赛。意大利队因此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唯一一个需要打预选赛的东道主球队。他们的对手是希腊队，第一回合意大利队主场以 4：0 获胜。随后，意大利政府计划在雅典为希腊足协修一栋房子，后者投桃报李，退出与意大利的第二轮较量。

5 月 27 日，在意大利队对阵美国队的首场比赛中，罗马法西斯国民党体育场座无虚席。墨索里尼在被黑制服团团围绕的包厢里骄傲地指挥着这场比赛，意大利队员从场地中央高举右手向看台上致以法西斯式的敬礼，随后将美国队刷了一个 7：1。为了扩大影响，墨索里尼要求意大利广播电台进行直播，世界杯赛上首次进行了电台直播。

四分之一决赛对西班牙队是东道主遭遇的第一场硬仗，西班牙队先进 1 球，上半时结束前，意大利队 3 名球员撞倒对方门将后破门，主裁判判定进球有效。下半时西班牙队 1 个进球被吹掉，双方按规则需重赛。6 月 1 日，意大利队在重赛中先进 1 球，西班牙队随后扳平，但被判进球无效，东道主由此挺进 4 强。

本届世界杯上，尽管墨索里尼不厌其烦地声称，他们举办了最公平的比赛。然而东道主的幕后活动却证实了他们的真实目的——为了意大利队和德国队能在决赛中相遇。

不过德意双双进入决赛的如意算盘还是落空。因为德国人在半决赛上被捷克斯洛伐克队拦下。这支拥有神射手内耶德里的铁军拒绝臣服。6 月 3 日在罗马，他们以 3：1 干掉了德国队，内耶德里独中两元，墨索里尼在决赛中迎来了一个“意外”的对手。

为了让决赛不再发生“意外”，拥有指定裁判权的墨索里尼，选择了丹麦裁判埃克伦德执法意大利队参加的半决赛和决赛，事后传言埃克伦德曾被墨索里尼召至包厢，并命令他在



有争议的时候必须作出对意大利队有利的裁决，以白色恐怖压迫裁判，可谓开假球黑哨之先河，尽管埃克伦德后来对此表示否认。最终，意大利队 1：0 力克奥地利队，杀入决赛。

“要么胜利，要么死亡”

在墨索里尼看来，像捷克斯洛伐克这样先天不足（1918 年才建国）的国家也敢与伟大的“罗马帝国传人”——法西斯的意大利相对抗，简直是对他本人的挑衅。决赛前，墨索里尼明确要求意大利必须拿冠军：“这只是个选择题，要么夺冠，要么去死”。难能可贵的是，意大利队教练波佐“将军”当时给了这样的答复：如果在场上我们踢得比捷克斯洛伐克队好，我们就能拿冠军；假如事情恰恰相反，我们就该满足当亚军。

6 月 10 日，罗马法西斯国民党体育场座无虚席，惨烈的决赛上演了。

离比赛结束将近 20 分钟时，捷克斯洛伐克队率先破门，墨索里尼的脸一下子就黑了，现场 5 万名球迷也沉寂下来，随后，捷克斯洛伐克队差点将比分扩大，但球却打在了门柱上。幸好在终场哨声响起前，墨索里尼“引进”的阿根廷球星奥西在第 81 分钟为意大利扳平了比分。加时赛中，“将军”波佐再次展现调兵才能，他指示中锋斯奇亚维奥和右边锋瓜伊塔每隔两三分钟就互换一下位置，这让对手的后防线很难适应。加时赛至第 97 分钟，在梅阿查的传球助攻下，斯奇亚维奥打进致胜一球。最终，在全场观众“Duce”（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称呼，意为“领袖”）的狂呼声中首次夺冠，他们身后躺倒了 11 名遍体鳞伤的捷克斯洛伐克球员。

在世界杯结束后的第四天，墨索里尼在本土第一次和希特勒会面，尽管希特勒的头昂得更高，但墨索里尼在谈到诸如体育和荣耀等问题时显得更有底气。

后来，国际足联出台两项规定：其一，主裁判改由裁委会直接任命，避免东道国控制裁判；其二，球员今后只能代表一国参加世界杯，不允许改换国籍重复参赛。这两条无疑都是针对墨索里尼作出的改变。无独有偶，在 4 年后的法国世界杯上，为继续宣扬法西斯主义，足球再次成为墨索里尼的工具。在这届世界杯上，意大利队一改“蓝色军团”形象，球员穿上了黑色球衣，以示对黑衫党领袖墨索里尼的敬意。由于没有主场之便，墨索里尼略有收敛，但他那封发给国家队的“胜则奖、败则杀”的著名电报，可谓“旷古烁今”。幸运的是，在国际足联以及对手的普遍同情下，意大利队 4：2 击败匈牙利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卫冕成功的球队。输掉决赛的匈牙利队员为此开玩笑说：“我们输了一场比赛，但救了 22 个人的命。”

链接部分：意大利知名的法西斯球星

国际米兰传奇巨星朱塞佩·梅阿查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法西斯主义者。梅阿查在为国际米兰效力的 224 场比赛中攻进 248 球，成为国际米兰历史上最为伟大的“射门机器”。梅阿查



在代表意大利队比赛时,每次进球就会大喊墨索里尼的名字。1938 年法国世界杯上，意大利在半决赛中对阵巴西，他们获得点球机会，梅阿查上前主罚。不巧这时他短裤的松紧带断了，球裤几乎要脱落下来，但梅阿查左手提着裤子，右手将球放在罚球点，并一脚踢了进去，最终意大利以 2：1 淘汰了对手。

原意甲拉齐奥前锋迪卡尼奥，无疑也是知名的法西斯信徒。在 2005 年的意甲联赛中，迪卡尼奥向拉齐奥球迷行了一个单臂的罗马式敬礼，这是极具纳粹色彩的礼节方式。随后，迪卡尼奥收到了禁赛的罚单。

意大利帕尔玛队前门将布冯同法西斯同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加盟尤文图斯队前，曾有段时间选择 88 号作为球衣号码。因为德语字母表中，第 8 个字母是“H”，两个“HH”在一起就有“嗨！希特勒（Heil Hitler） ”的意思。而“嗨！希特勒”这句口号在“二战”期间的德国为众多纳粹信徒的口号。布冯对此无辜地表示，“说我是‘纳粹’伤害了我。我选择 88 号是因为他提醒我‘四个球’，在意大利我们都知道它意味着“力量和决心”。我开始并不想选择 88 号，而是想要 00 号，但那是不符合规定的。”布冯后来无奈改穿 77 号。

文章来自《文史参考》第 11 期。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闵勉：当足球遇到独裁者

记者

“

在 1978 年 6 月 25 日第十一届世界杯的决赛场上，阿根廷 3：1 击败荷兰，在本土捧起世界杯。阿根廷人民为胜利忘我庆祝，而其他人却纷纷指责它与秘鲁的那场比赛。那时的阿根廷队员还不知道，他们赢得奖杯的背后，军政府进行了怎样肮脏的交易。

”

对于足球运动在人们生活中的分量，英国的足球名宿比尔·香克利曾留下过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足球无关于生死，它高于生死。”香克利最辉煌的足球生涯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英国，不知他是否想到，足球从来就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一旦这样的政治又属于某个独裁者，那么足球就真正会关乎生死了。从斯大林、佛朗哥，到阿根廷的军政府，再到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莫不如此。

斯大林：被流放的莫斯科中央陆军

斯大林不是真正的足球迷，而且他在二战中失去了热爱足球的爱子瓦西里，这让斯大林对足球更不感冒，但足球作为集体性的竞技项目，却免不了成为其专制意识形态下的牺牲品。

二战后，苏联百废待兴，到 1952 年赫尔辛基奥运会时，神秘的苏联国家足球队才第一次出现在了国际大赛的比赛中。在那届奥运会上，苏联一路顺风顺水打入了半决赛，而他们在半决赛的对手则是南斯拉夫。

当时的国际形势很多人都清楚，铁托手下的南斯拉夫并不愿意听从当时所谓的苏联老大哥的命令。因此在这场比赛中，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冲突。那场比赛中，苏联队很快就以 1：5 落后于对手。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苏联队快要被淘汰了。不过，当芬兰的现场广播员这样说：“不要低估了俄国人的实力，他们会让你们吃惊。”他刚说完这句话之后，苏联人便很快地连进 4 球，将比分扳成 5：5。不过，在后面的附加赛中，苏联还是 1：3 输给了南斯拉夫。

苏联队的这场失利给了斯大林相当大的震惊。此时已是“革命导师”的斯大林认为，苏联对南斯拉夫的失利，就是苏联“社会主义”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一次惨痛的失败。



就因为这样，参加了 1952 年奥运会的那批苏联队队员遭到了斯大林的残酷对待，他们成为铁托的替罪羊。国家队归国后，斯大林就将拥有国脚最多的中央陆军队的队员全部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即使中央陆军队有着军方的背景，但斯大林一声令下，根本没人敢抗拒。

幸运的是，随着 1953 年斯大林去世，这批中央陆军队的队员很快结束了流放生涯，并得到平反。

佛朗哥：被枪毙的巴塞罗那主席

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俱乐部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足球俱乐部之一，百余年的俱乐部历史上，留下了太多传奇式的球星，克鲁伊夫、马拉多纳、罗马里奥、罗纳尔迪尼奥，一直到今天的梅西。

加泰罗尼亚人称巴塞罗那队为“巴萨”，对于他们来说，巴萨从建队开始，就代表了加泰罗尼亚的精神，也是这一地区寻求从西班牙独立的象征，但这为球会带来了不少灾难。

1925 年，西班牙正处于里维拉的军事独裁时期，因为有一些巴萨的球迷向西班牙国歌发出嘘声，表达对当时政府的不满，巴萨被勒令关闭主场 6 个月。里维拉政权对巴萨的打击措施还包括：禁止在球场内使用加泰罗尼亚旗帜，全部会员资料都要由警方登记，俱乐部公告必须使用西班牙语……

整个 20 年代，西班牙国内不同势力的对立和社会动荡一直持续，暴力事件在全国蔓延。1936 年 7 月 17 日，西班牙内战打响，此时担任巴萨主席的是上任仅一年的约瑟普·索诺尔。索诺尔是土生土长的巴塞罗那人，其家族以财力雄厚和参与政治著称，早在 1925 年，他不顾里维拉对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的打压，成为巴萨会员。《巴萨，人民激情所在》一书的作者杰米·伯恩斯认为，索诺尔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巴萨会员，是购买了一张通向加泰罗尼亚精神之源的门票，标志着他认可了同马德里威权主义进行的斗争。不过，索诺尔签到的实际上是一张地狱的门票。

1936 年 8 月，刚成为巴萨主席一年的索诺尔，冒着内战战火途经瓦伦西亚前往马德里，这次行程跟巴萨和足球都没有关系：他要跟有共识的政治人士举行会谈，还计划拜访参加马德里保卫战的加泰罗尼亚纵队的志愿者。这次他走上了不归路。

8 月 4 日，索诺尔一行到达瓦伦西亚，用了不到 24 小时便到了马德里，当地军方借给他一辆汽车，索诺尔前往当时已经成为战场的瓜达拉马山区。8 月 6 日，在瓜达拉马山区，这辆挂着加泰罗尼亚旗帜的汽车驶进佛朗哥军队的控制区，索诺尔被认了出来并遭到逮捕。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他和同伴们被当场枪决。

一周后，他的死讯传到巴塞罗那，各阶层普遍出现骚动。随后几个月里，流传着很多种说法，有人说他被投入监狱，还有人说他逃到了瑞士，但人们普遍认为他是被佛朗哥下令杀



害的。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索诺尔的尸体才被发掘出来。2009 年，巴萨为他们昔日的主席迁移了坟墓，70 年之后，索诺尔终于魂归故里。

佛朗哥是个不折不扣的独裁者，但他同时又是一个超级球迷，他选择支持最强的球队——皇家马德里，他让皇马重新受封一度被取消的皇家封号，注入大量资金让其购买球星。而在西班牙国内，巴萨和皇马从来势不两立，加之索诺尔还是个坚定的左翼分子，政治和志趣两方面的对立，是索诺尔遇害的深层原因。

巴塞罗那的球迷相信，是佛朗哥帮助皇马确保了所有比赛的胜利。1943 年西班牙国王杯半决赛巴萨和皇马巅峰对决，第一回合巴萨主场 3：0 取胜，但一周后客场却离奇地以 1：11 的悬殊比分输给了皇马，由此，巴萨球迷坚信是赛前佛朗哥用枪顶着巴萨球员的头，受到死亡威胁的他们才输掉了比赛。

巴萨和皇马之间恩恩怨怨一个多世纪，这场比赛如此特殊，让人们不得不相信有佛朗哥的独裁意志在起作用。

阿根廷军政府：买来的世界杯冠军

1810 年 5 月，阿根廷赢得了独立。然而，推翻了殖民统治，却并非意味着和平与建设的开始。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内，阿根廷国内对立的局面从未改观，特别是首府布宜诺斯艾利斯与各省之间，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经常发生纷争与冲突，阿根廷长期处于动乱和分裂的状态。每当政权不能正常更替，或是社会出现严重动荡时，权势集团就不得不把军队请出来收拾局面，军队常常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

1976 年 3 月，陆军总司令豪尔赫•魏地拉推翻贝隆夫人自任总统，阿根廷军政府随之成立，它比智利的皮诺切特晚了两年多，但比后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大肆搜捕、严刑逼供、秘密处决，无所不用其极，许多无辜者被牵连受害。据民间组织的调查，有名有姓的“失踪者”（被捕后下落不明，据称大部分被秘密处决）达 8000 多人。阿根廷军政府处决疑犯的方式惨无人道，有许多是用麻袋装着从飞机上扔进沼泽地的。

面对国际舆论的口诛笔伐，阿根廷军政府自知理亏，正在这时候，1978 年第 11 届世界杯在阿根廷举办，当局希望通过阿根廷足球队在本届杯赛上的表现为政府“正名”。这届世界杯对于他们的意义，就跟 1936 年奥运会对于希特勒一样重要。众所周知，希特勒也曾利用体育和运动员来替纳粹政权粉饰太平。

1978 年 6 月 14 日，该届世界杯进入第二阶段比赛，阿根廷、秘鲁、巴西、波兰四队分在第一组。最后一轮，为了挤掉对手巴西，东道主阿根廷队必须净胜实力强劲的秘鲁队 4 球以上，才能参加冠军争夺战。舆论普遍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



6 月 21 日，世界杯史上最让人怀疑的一场比赛开始了。阿根廷人攻势如潮，而在小组赛中有出色表现的秘鲁队却手忙脚乱，似乎不会踢球，甚至两次将球打在自家门柱上，秘鲁队前锋在阿根廷队空旷的球门前两次错过了极容易得分的机会。

秘鲁队在比赛中使用了四名没有比赛经验的替补队员，并在无任何明显理由的情况下，把一名防守队员调到前面充当进攻队员。更令人奇怪的是，秘鲁队领队——秘鲁军政府的首脑贝尔穆斯德的儿子命令，脱去正式的秘鲁队服，穿白衬衫踢球。

比赛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阿根廷队竟以 6：0 大胜，凭借净胜球优势，一场未败的巴西队被挤出了冠军争夺战。阿根廷随后在决赛中 3：1 击败荷兰，在本土捧起世界杯。阿根廷人民为胜利忘我庆祝，而其他人却纷纷指责它与秘鲁的那场比赛。

人们一直怀疑那场半决赛的真实性，但苦于没有证据，多年来它成了悬案。直到 2001 年初，秘鲁人经过 23 年的沉默，讲出了当年那场球赛的真相。英国作家大卫•雅洛佩将他对三名秘鲁国家队球员交谈的记录整理成书，出版了《比赛是如何偷走的》，揭露了这个惊天疑案。

当年阿根廷为了确保那场对阵秘鲁的关键比赛能取得胜利，暗中花大价钱做了手脚。阿根廷军政府直接出面买通秘鲁政府，允诺提供 5000 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帮助拮据的秘鲁政府渡过难关，并用船为秘鲁运去 35000 吨谷物。

在雅洛佩的新书出版后，秘鲁的《商报》也就此事进行调查。前秘鲁国家队成员奥博里塔斯说，1978 年阿根廷和秘鲁之战背后有些古怪的事情，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而另一名秘鲁国家队前队员则透露说，当时不仅仅是阿根廷想贿赂秘鲁，连巴西人也打过同样的主意。当时巴西人许诺说，如果秘鲁在那场比赛中击败阿根廷，将其淘汰出局，他们就会把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一块面积不小的土地赠送给秘鲁国家队队员。

今天魏地拉将军仍然健在，但自 1988 年他的独裁政权被新的民主政府宣布为非法以来，就一直被软禁在家。当年那场肮脏的比赛，虽未涉及人命，但魏地拉用金钱换来的胜利和金杯，乃至因此换得的民众好感，也无法为军政府独裁下冤死的无数亡灵昭雪。

乌代：罚失点球的惩罚

萨达姆长子乌代 1964 年出生于巴格达，后毕业于巴格达大学法律系，获得博士学位。同他的父亲一样，乌代也堪称传奇人物。很长时间以来，乌代被认为是萨达姆政权的接班人，直到 1996 年，乌代被一群不明身份的枪手打伤致残。

自称是狂热球迷的乌代被认为是伊拉克足球的“教父”，他本人则身兼奥委会主席和足协主席两职。第一次海湾战争后，乌代一手创建了伊拉克国内联赛的体制，他所掌控的伊拉



克电视台对欧洲联赛也经常进行直播。有意思的是，2002 年的韩日世界杯，该台对所有美国队参加的比赛也都进行了现场直播，同样处于他控制的《巴比伦报》还经常对美国队的表现作出评价，并得出结论："美国足球比以往进步了许多。"

作为足协掌门人的乌代对伊拉克国字号球队的表现非常在意，他认为"国家队的比赛体现了伊拉克的尊严"。在他的带领下，伊拉克足球一直处于亚洲的前列，在国际足联的排名中经常超过中国队。不过，很少有人知道伊拉克球员为"国家荣耀"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2003 年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之后，乌代对伊拉克足球界的独裁统治相继被曝光。他经常因为踢不好球而用严厉的手段惩罚球员，甚至用藤条抽打，拔掉手指甲等酷刑。为此一家总部设在伦敦的人权组织甚至将乌代告上了法庭，只因证据不足，调查不了了之。直到该年 5 月，阿根廷《号角报》报道了对伊拉克国家队球员的采访，舆论一片哗然。

根据国家队队员介绍，他们平时几乎每天都要接受乌代的训话。这位伊拉克足协主席甚至威胁要把他们的腿砍下来喂狗。没有参加训练的人，即使是因为照顾生病的孩子，或参加直系亲属的葬礼，也要被关进监狱。输掉或打平一场比赛，就会遭到电棍的敲打和往身上泼脏水。国家队的队员们终日生活在乌代的监视之下。球员在比赛中出现各种失误，都会根据其严重性受到惩罚，吃到一张红牌是特别不幸的事情。

2001 年在约旦进行的一场世界杯预选赛中，伊拉克国家队与阿联酋国家队在 90 分钟内战成平局。规则规定应互罚点球决出胜负。伊拉克队中场队员扎伊尔口中念着祷告词，观众认为他无非是在为胜利祈祷，但事实上并没有那么简单。每一个伊拉克队员都清楚如果罚失点球的严重后果：忍受公众潮水般的羞辱，然后是长时间的禁闭生活和皮肉之苦。因此，只有 3 个伊拉克队员有勇气去罚点球，扎伊尔就是其中之一。

扎伊尔说："当时，大部分队员甚至不愿碰一下皮球，但如果没有人挑起罚点球的担子，全队都会受到处罚。"结果，扎伊尔不幸射失了点球。两天后，国家队返回了巴格达。扎伊尔被召到了伊拉克奥委会的办公室。刚到那里，扎伊尔就被人蒙上了双眼，然后关进了一间单人牢房，一关就是 3 个星期。

人们似乎很难理解从未当过运动员的乌代为什么对足球运动如此着迷。据伊拉克国家队队员说，实际上他对足球一无所知。然而，乌代的步步高升却与足球有关：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他试图利用足球赢得支持率。为此，他自己宣布担任伊拉克奥委会主席和足协主席。而在 1996 年遇刺受伤之后，乌代在仇恨的驱使下对表现不佳的球员用刑更是变本加厉。

在战火和独裁的阴影笼罩下，踢球对伊拉克人来说已是奢侈的事，但没有什么可以阻挡那个黑白相间的皮球对人们的吸引，2007 年，满身创伤的伊拉克夺得了欧洲杯冠军，让世人肃然起敬。这也许就是足球最大的魅力。



文章来自共识网，原文刊于《文史参考》。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黄姜片 杨草苍 卫诗捷：马云许家印们的足球政治

记者

“

其实有影响力的足球俱乐部在当下的中国，是一张不可多的名片，它有助于这些资本大佬们在自身领域攻城略地，构筑起自身强有力的政治资本，并反哺自己进一步攻城略地。

”

不久的将来，以恒大俱乐部为中心，以马云、许家印为首，将形成一个新的足球新贵圈，或许，他们还将扮演类似于“骷髅会”的角色，主导中国足球未来的走向。而下一个涉足者是谁，将是什么玩法？

2014 年 6 月 5 日 11 点 11 分，是中国足球的大日子。恒大发布会在广州召开，四个 1 似乎昭示着其要一统足球江湖的决心，恒大网站首页还挂出了“恒大未赢够”的口号。

在这个时刻，阿里巴巴的马云和恒大的许家印联合宣布，阿里巴巴将为恒大足球俱乐部注资 12 亿，买下该俱乐部 50%的股权，许家印很是自豪地说：“账面资金 24 亿，在欧洲俱乐部也是富人了”。

在未来一个时期，恒大俱乐部还要增资扩股，再发 40％的股份，引入 20 个战略投资者，经过严格挑选，每家持股 2％。马云对此也是少有的得意：“俱乐部的战略是，做第一，超过第一，恒大就是第一。”

马云在与许家印公开这桩“联姻”之前，还曾与绿城的宋卫平就入股绿城足球俱乐部进行过长时间的磋商，不过阿里巴巴最终还是选定恒大。

可以想见在不久的将来，以恒大俱乐部为中心，以马云、许家印为首，将形成一个新的足球新贵圈，或许，他们还将扮演类似于“骷髅会”的角色，主导中国足球未来的走向。

马云和许家印的结合，无疑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2010 年，恒大集团买断广州足球俱乐部，更名恒大俱乐部，当时，许家印不懂足球，连知名球员谁是谁都分不清楚；2014 年，马云入盟恒大，他对足球也基本上是不懂，连看恒大比赛都需要许家印短信通知。



其实，即使是在足球高度市场化、运作高度成熟的欧洲，除了曼联等少数几个俱乐部，依靠足球本身也很难赚钱。而在中国，足球是需要企业大力投入的事业，赚钱更是奢望。不过，这些对于有着雄厚资本实力、广阔资本网络的马云和许家印并不是问题。

在中超 16 家俱乐部中，仅有 3 家未有房地产企业支撑；其实有影响力的足球俱乐部在当下的中国，是一张不可多得名片，它有助于这些资本大佬们在自身领域攻城略地，构筑起自身强有力的政治资本，并反哺自己进一步攻城略地。

足球经济有限

1992 年，中国足球开始职业化改革，并在几年内迎来了中国足球的第一个高峰，全民对足球可谓是如痴如狂；但是随后因赌球带来的假球、黑哨等，快速地摧毁了中国足球，中国足球几乎从巅峰坠入谷底。

直到 2008 年，时任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身着皮鞋和正装，前往秦皇岛考察奥运场馆，当场展示脚法，还进行了数次射门。事后，习近平还在各类不同场合关心中国足球的发展，这给处于边缘状态的中国足球注入了新的活力。

随后，中国各大企业携雄厚资本，纷纷入主各足球俱乐部。早在 2007 年，第九城市董事长朱骏就开始大力布局足球俱乐部，并于当年买下上海申花，并在 2010 年对外宣布意欲收购英超劲旅利物浦，并于 2012 年以年薪 1200 万欧元引入已属职业生涯暮期的德罗巴。

2010 年，许家印亦开始将触角伸向足球，以 1 亿元的高价全资买下因涉嫌假球被罚的广州队，更名为现在的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

2012 年，贵州茅台集团与从西安迁来的西安国际足球俱乐部达成战略合作，其对明也更改为贵州人和足球俱乐部国酒茅台足球队。

根据统计资料，2012 年中超的主要赞助商企业性质比例中，国企占据了 52%，成为最大的“金主”。外资则以 28%排名第二，私企占据 16%。而 16 家中超俱乐部中，仅有 3 家背后的企业未大规模经营房地产。

而在经营上，直接从球队获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恒大接手足球后，仅 2011 年，就将原本在 2010 年还盈利 77 万的俱乐部，变成了投资 4-5 亿，亏损达 1 亿的知名足球队。

2012 年，恒大足球俱乐部继续扩大战果，在球场上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但是当年亏损从 2011 年的 1 亿扩大为 2 亿；2013 年，恒大终于实现微薄的盈利，据恒大自身预测，将在 2014 年实现真正盈利。

虽然如此，恒大已经是整个中国足球的幸运儿了。2013 年，在中超 16 家俱乐部中，仅有恒大和辽宁两家略微盈利，其余 14 家皆处于亏损状态，亏损总计 2.6 亿元。



在连带的广告效应方面，其实也只有为数不多的企业获得了实惠，恒大即使其中之一。许家印自己计算过一笔广告帐："在中央电视台打广告的话，1 秒钟大概 15 万元。我们一场球下来，比如说 4 月 2 日中超开幕式在广州举行，有 25 家电视台现场直播，有 300 多家媒体报道。11 个运动员穿着印上了'恒大'两个字的背心，你说是不是很值钱？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如果做广告，要多少钱？"

很多论者认为，恒大投资足球促动了恒大的大规模扩张，其实恒大扩张始于 2009 年，即中央政府出台 4 万亿计划，它带来了恒大地产这一主营业务的大规模发力，与足球本身关系不大。

而同样投资足球的贵州茅台，于 2012 年入主贵州人和之后，对其主营业务不仅没有起到促动作用，还因为"八项规定"的出台，主营业务几乎形同跳水，酒价一路下跌，股价扶摇直下。

显然，影响这些企业经营效果的不是足球，而是其背后的东西。

足球政治无限

许家印投资足球，极善于将其与政治主旋律挂在一起，极善于"跟风"。刚入主恒大就打出"恒大为国争光"，2012 年，正值全国两会，恒大在此期间将迎来与韩国全北现代的比赛，开赛前 3 小时，许家印电话教练，要求其传达进一个净胜球奖励 200 万的指示，当天三个"洋球员"打入五球，击败韩国全北现代。

随后，许家印在全国两会上作为唯一的民营企业家代表发言。

2013 年 11 月 9 日，恒大夺得 23 年来首个亚洲冠军。在媒体的宣传中，布满了"足球梦，也是中国梦"，还进一步引申出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足球梦。一时之间，还有论者认为恒大夺冠体现了中国民族的强大，体现了许家印践行了"中国梦"，浑身都充满了"正能量"。

紧接着，2014 年恒大夺冠一事大规模登上"国考（国家公务员考试）"舞台，各类模拟试题更是将其作为时事考察热点，并延伸到了实现中国足球的"中国梦"，还与一位领导人对足球的三大期许——中国世界杯出线、举办世界杯比赛、获得世界杯冠军——结合起来，成为选拔考核公务员的重要题目。

不惟许家印如此，上海的朱骏亦是如此，有人指出："朱骏是典型的上海人，一块钱要弄出五块钱的声势来"。

《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曾引用某匿名人士的话，或许点出了其中真正的要害："投资足球是为了更加'隐晦'的利益，则来自潜在的'政商关系'，和高端人脉资源的整合。在



不少地方政府眼中，足球已经变成了地方的一张名片。投资足球，可以得到更多潜在的高层支持。而这种支持，对于房企拿地、授信等层面，起到巨大的作用。”

但是，他们离真正实现“中国足球的中国梦”还太遥远了，他们不是着力于培养中国球员，而是花大价钱买入外国球员，进球、赢比赛、上头条，这样的策略固然可以一时提振中国足球的关注度，增加国人观看中国足球的频次，但是它不具备可持续性。

虽然，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国足球确有起色，但是衡量中国足球的重要指标，目前来看，不是中国俱乐部愿意一掷亿元买进欧洲球员，而是欧洲俱乐部是否愿意一掷亿元买入中国球员，显然，从这一点来看，中国足球似乎又没有多大进步。买进外国球员的做法，长远看来是在走“邪路”。

足球，在普通民众那里，是一种观赏性极强的体育赛事，在国家那里，或许有着不同的含义，是表达软性实力的一种重要方式。某种程度上，足球是现代国家宣扬自身强大的一种方式，因而欧洲国家领导人普遍关注本国球员在国际赛事中的表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非常重视足球。2009 年，习近平在德国拜耳公司参观，获赠了勒沃库森的 10 号球衣和一个 2006 年世界杯专用足球。他提到了中国足球：“中国有一流的球迷和全世界可观的足球市场。举办完奥运会之后，中国下了一个决心，既然我们其他的运动可以拿到金牌，那么足球啊，一定要下决心搞上去，但是这个时间会很长。”

而且，一个事例足以说明习近平对足球非常熟悉，2013 年他在接受巴西记者提问时，特别提到了 2010 年南非世界杯的预言帝章鱼保罗：“体育竞赛特别是足球比赛的魅力，就在于不可预测。上届世界杯有章鱼保罗，不知道明年还有没有可以预测未来的章鱼？巴西足球队有主场之利，我祝巴西队好运。”

习近平近年来慰问男足、视察女足，在爱尔兰亲自试脚，在德国获赠勒沃库森 10 号球衣……如此种种，除了自身兴趣之外，当然是要温和地展示中国的强大。

但是，如今的恒大俱乐部们，却靠高价引入外籍球员，让这些外籍球员在赛事胜利后，举着中国国旗绕场“扬威”，这可能真的无益于展示中国的软性实力。

所以，玩球有风险，玩球需谨慎。

文章来自共识网，原文转自《财经》微信号，更多文章请关注 ID：mycaijing。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克韩/郑诗亮(采)：克韩谈世界杯、足球与政治

郑诗亮（《上海书评》撰稿人），克韩（《体坛周报》资深评论员、英超记者）

“

当亿万人都对一项运动关切时，它就已经不仅仅是运动了。足球从来不只是足球：它会帮助创造战争和革命，它也会让黑手党和独裁者着迷。

”

又是一届世界杯。球迷迎来了节日，非球迷遇上了受难日，伪球迷呢，不断地被网下网下的各色人等灌输各种攻略、教程，被迫接受信息轰炸。其实真不用这么复杂，足球是一项让人快乐的运动，不懂足球，也可以从足球当中获得乐趣，比如读读克韩的名文《世界杯野史》。作为《体坛周报》的资深足球记者，克韩已经报道了国际足球十数年。但可能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他还曾是新华社驻耶路撒冷的国际新闻记者，刚入行不到一年，就拿到了“中国国际新闻奖”通讯专题类一等奖。正因如此，克韩谈世界杯带入了许多他对国际政治的思考与见解。他引用的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足球从来不只是足球：它会帮助创造战争和革命，它也会让黑手党和独裁者着迷。”

先从巴西世界杯说起吧，正好世界杯快开幕了。最近一年来，巴西民众、知识分子对政府的抗议、质疑，好像一直就没停过。怎么会这样？

克韩：巴西是一个非常爱足球的国家。它是在 2007 年 7 月正式提出申办世界杯的，同年 10 月正式获得世界杯主办权。2008 年的一项民调显示，当时巴西国内民众对举办世界杯的支持率是百分之七十九。但是 2014 年 4 月的最新民调显示，支持率只有百分之四十八了，首次跌破百分之五十大关，也就是一半民众不支持在巴西举办世界杯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逆转呢？民众主要是觉得政府对世界杯投入太多，他们担心，这会导致教育、医疗、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投入减少。

其实，举办世界杯的投入不能光算作成本，它也是一种投资，会带来很多经济发展的机会，最直接的就是旅游业的发展。比如，过去很多人不知道休斯顿飞到亚马逊丛林的玛瑙斯——也就是英格兰队和意大利队大战的所在地——只要四个小时，现在巴西一办世界杯，大家都知道了。



实际上从卢阿政府到罗塞夫政府，思路非常的一致，就是想靠世界杯促进发展。办一次世界杯投入虽然多，相当于在全世界打了个形象大广告。通过世界杯，让全世界的人们对某个城市、某个国家产生兴趣，历史上是有成功先例的。

问题就在于，巴西对世界杯的投入非常高。目前来说，巴西世界杯的成本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一百一十亿美元，一种是一百三十亿美元。无论哪一种，都和举办世界杯的收益有巨大的差距：按照经济学家测算，巴西世界杯带来的收益是三十五亿美元，但其中大部分被国际足联拿走了；巴西奥运会预算一百五十亿美元，但收益也只有五十亿美元，同样大头被奥委会拿走了。

最重要的是，这里面不断有腐败、回扣的丑闻传出来。如果说这一百多亿全部投资在基础设施上的，政府还有可能说服民众，说这些公路、机场修了，有利于将来的发展。但恰恰就是这一点难以服众，因为钱都花在建球场上了。

比如说，巴西政府在巴西利亚花九亿美元建了一个新球场，大家都知道巴西利亚是凭空造出来的首都，那里没有传统的巴西甲级联赛豪门，世界杯结束了，这球场就没用了，还得花很多钱去维护它。英语里有一个词组叫 White Elephant，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与此同时，很多配套的基础设施却来不及完成。我看到的资料是，一共有九十三个和世界杯有关的大工程，只有三十六个能在世界杯之前完成。

还没得到什么好处，钱倒花了许多，难怪巴西老百姓不满意。

克韩：而且很多钱民众认为被贪污掉了，本来巴西国内经济就不景气。2007 年申办世界杯的时候巴西经济数据很漂亮，当时巴西和中国一起号称金砖四国，但没想到申请到世界杯主办权之后，马上就是全球金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世界杯投入一百多亿，奥运会又是一百五十亿，巴西民众很失望，觉得钱花得大手大脚又没花对地方。

其实，民众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某个项目一定贪污了吗？没有。可是大家都这么认为，尤其是看到新建的球场天顶漏水，看到安全事故死了很多人，心里就很容易产生想法，再加上公共福利的缺失，种种状况都让民众对世界杯产生了很多不满。

不妨这样说，巴西人是很爱足球，但还没有到花这么多钱去爱的地步。钱到底应该怎么花、花多少，他们的想法是非常实在的。有饭吃，能看病，有老师教小孩读书，这些都是比足球更为基本的需求。巴西的教师协会最近游行时还打出一条标语，大意说：教师挣的比内马尔都少。这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中国过去流行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现在，巴西各个阶层都在对世界杯表达不满。我今天还看到一条新闻说，有些球迷甚至希望巴西队世界杯输球、出局。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如果巴西队拿了冠军，好了，什么坏事都一笔勾销，大家都觉得世界杯办得好，所以巴西队不能拿冠军。



卢拉政府和罗塞夫政府都是左翼政府，靠了老百姓支持才上台的。现在竟然搞得天怒人怨。

克韩：卢拉是工人党的领袖。这两天我在看巴西拍的一部卢拉的传记电影，叫《卢拉传》，自然是主旋律影片。里面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是他在体育场内高喊口号呼吁工人罢工抗议。看到这里，你会觉得，这不就是现在巴西正在发生的事情嘛！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轮回。左翼是喊着满足民众对福利的需求这种口号上台的，结果并没有达到人们的期望。

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球场建得美轮美奂，花了很多钱，另一方面，各个阶层的生活水平都在下滑，各种不满情绪都聚集在世界杯上。各路人马都想抓住机会抗议或罢工一下，世界杯期间，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巴西，政府让步的可能性比较大。

2007 年写好的剧本，到 2014 年上演时，发现满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克韩：形势已经和卢拉当年设想的完全不同了。足球界人士分成了两派：保皇党和反对派。反对派以罗马里奥为代表，这位当年的足球巨星现在从政，是国会议员，他针对政府的世界杯组织工作提出了很多批评。他起初是支持巴西举办世界杯的，但后来发现贪污腐败丑闻层出不穷，他就把矛头指向巴西政府了。

保皇党的代表是贝利，另一个代表是咱们叫外星人的那个罗纳尔多，他是世界杯组委会的成员之一。但就连罗纳尔多也表示，有些钱可能花得是有点不在地方，有些工程项目没有及时建好。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在指摘巴西政府。整体的舆论形势，对巴西政府非常不利。

当然了，这种对世界杯的不满是否会影响巴西大选的结果，恐怕还要再看。从 1994 年开始，巴西每四年一次的大选都是和世界杯重合的。1994 年卡多索竞选总统的时候，巴西拿到了世界杯冠军，他认为这对他当选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大家后来又研究了其他几次竞选，1998 年巴西没有拿到冠军，卡多索还是连任了，2002 年巴西又拿到冠军，这一次卡多索只派了候选人，没有当选，卢拉当选了。所以世界杯冠军和竞选结果也不是完全对应。

今年的世界杯结束后，10 月份巴西就要举行大选。所以罗塞夫是非常希望这次世界杯取得成功的，不仅是巴西要拿到第六个冠军，而且组织工作不能出大的岔子。这样对她的竞选才有帮助。

但罗塞夫政府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这届世界杯和以前不一样，是在巴西本土举行的，组织能力的强弱对大选一定会产生重大影响。我相信卢拉和罗塞夫现在肯定在祈祷，祈祷巴西队能拿到冠军，如果真拿到了的话，一切问题都将不再是问题。

是不是南美这种把政治利益和足球挂钩的情况非常常见？

克韩：以前一直有一种说法，1970 年世界杯巴西拿了冠军，让巴西当时的军政府又续了几年命。虽然历史学家认为这种说法不太经得起推敲，但是接下来 1978 年在阿根廷举办的世



界杯，阿根廷队拿冠军的确客观上有利于巩固军政府的统治。南美民粹政府确实比较多，历史上这种先例不少。

阿根廷是在 1970 年代初拿到世俱杯主办权的，但到 1976 年军方组成了一个军政府。为了压制反抗意见，阿根廷军政府对反对派用了酷刑。同时经济预算也是一切为世界杯让路，当时，阿根廷有一句俗语：“一切等世界杯结束后再说。”意思是说，民生工程全部让位于世界杯，否则军政府的钱就不够了。军政府提出了一句口号：“两千五百万阿根廷人为世界杯而战（Play）”，结果被调皮的民众改成了“两千五百万阿根廷人为世界杯付钱（Pay）”。最后，预算是七千万到一亿美元的阿根廷世界杯，花费了七个亿，差不多是四年后西班牙世界杯支出的三倍。

为了拿到冠军，阿根廷军政府是无所不用其极。大家都知道，1978 年世界杯，有一场比赛是阿根廷对秘鲁，当时他们需要净胜四球以上才能出线，最后秘鲁输了个零比六。幕后交易是什么呢？据说阿根廷军政府给当时的秘鲁军政府免费运了三万五千吨谷物（也许还有军火），还解冻了秘鲁军政府在阿根廷的五千万美元资产。

如果说世界杯历史上有一场证据相对确凿的假球的话，那这场比赛就是了。当时秘鲁派了一个出生在阿根廷的归化球员当门将，还上了四名替补球员，门前有进球的机会也不进。而阿根廷的肯佩斯和塔兰蒂尼据说因为服禁药，赛后一个小时还得不停地跑，否则药劲就缓不下来。

但是你看，因为民众太喜欢足球了，所以，军政府尽管做了这么多倒行逆施的事情，还是得到了人们的支持。阿根廷世界杯开幕的时候，有一个法国记者写开幕式的稿子，说他听到场外传来枪声，似乎军政府在镇压民众。其实他把事实搞错了，因为附近确实有一个射击训练场，他听到的枪声是从那里传出来的。这篇报道登出来之后，就在新闻发布厅，阿根廷记者把这个记者揍了一顿。最后，民众非常有意思地与军政府形成了“共谋”。

足球和民族主义的关系实在很耐人寻味。它不仅仅是一项受欢迎的运动，还成了某种可以用来拉拢本国民众的工具。

克韩：事实上，世界杯从第二届起就被政客拿来利用了。当时由于报名球队首次超过决赛席位，国际足联冒着让东道主墨索里尼发怒的危险，坚持要求意大利也参加世预赛。幸亏意大利在预选赛首回合四比零狂卷希腊。至于次回合，墨索里尼等人成功地劝服了希腊，说次回合“没有必要”举行了。

后来希腊有人爆料说，意大利同意在雅典为希腊足协建造一幢大楼作为交换（有一说是，使用权只到 1980 年）。这至今仍是历史上唯一一次东道主参加世预赛的例子（2010 年世



界杯东道主南非也参加了世预赛，但这是因为非洲区世预赛同时也是 2010 年非洲杯的预选赛）。墨索里尼训令说“不夺冠，就死”，意大利队最后真的拿到了冠军。

墨索里尼个人很喜欢足球，他和拉齐奥俱乐部的关系密切，拉齐奥看台至今依然被经常称作 Duce（元首）。在墨索里尼统治期间，著名的国际米兰只能改名，因为元首不喜欢“国际”这个字眼。当时很多球场也都改叫“法西斯国家党球场（罗马）”或“墨索里尼球场（都灵）”，甚至一些比赛开场前裁判也会行法西斯举手礼。

希特勒倒是对世界杯不感兴趣，据说他平生最讨厌足球，唯一一次有史可考的亲临足球场是 1936 年 8 月 7 日的柏林，无奈德国队却在这场奥运会足球赛中被挪威爆冷击败，希特勒没等终场哨响就气冲冲走了。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元首很生气！”

西蒙•库珀在他那本著名的 Football against the Enemy 里说过一句名言：“足球是通往权力的捷径。”因为足球确实能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道理非常简单，一到足场上，就是我者对他者：我的球队和你的球队，本国的球队和外国的球队。

西蒙•库珀还说过：“当亿万人都对一项运动关切时，它就已经不仅仅是运动了。足球从来不只是足球：它会帮助创造战争和革命，它也会让黑手党和独裁者着迷。”大家都知道斯大林并不怎么喜欢足球，但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就很喜欢足球，据说他在严刑拷打反对派之余，就只有两个嗜好：让司机开着豪车满莫斯科乱逛，到处找美女，要不就是看足球。他自己也踢球，场上的位置是左后卫，还当过莫斯科迪纳摩的主席，因为迪纳摩是秘密情报局的球队。

很少有人知道，带领巴西打入 1970 年世界杯的并非是后来带队夺取冠军的扎加洛，而是一个叫萨尔达尼亚的教练。但萨尔达尼亚以前是共产主义者，军政府的独裁者梅迪奇将军为了足球愿意捐弃前嫌，邀请萨尔达尼亚去总统府出席宴会，但萨尔达尼亚拒绝了，说训练日程安排不允许。后来他也不肯选梅迪奇将军最喜欢的球员，他还说：“我不帮总统选他的部长，他也别帮我选前锋。”最后梅迪奇将军忍无可忍，在世界杯开始前三个月把他解雇了。

所以，卡塔尔要贿选 2022 年世界杯，其实也是希望提升这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声望？

克韩：这是最近《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的新闻，他们从国际足联内部人士那里拿到了几亿电子邮件、电话记录等文件证据，用了足足两个月时间去爬梳，试图去证明哈曼曾经给非洲等国家的足球人士提供了三百万英镑的贿赂。

不妨这样说，一个国家越不发达，在世界上越不起眼，对世界杯就越重视，因为发达的国家有其他很多自豪的东西可以展现，对穷国、小国来说，可能只有在大赛上当一回“学霸”，才能让其他的高帅富国家注意到你。赞比亚在首尔奥运会上四比零击败意大利，意



大利的报纸就登了一张非洲地图，特别把赞比亚标记出来。赞比亚这样的国家靠了这种办法，才能出现在西方媒体。

在很多非洲国家，体育部长这个职位可能和内务部长一样重要，原因就在这儿。非洲国家对足球的重视到了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非洲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黑非洲球队应该是 1974 年的扎伊尔，也就是现在的刚果（金）。有一场比赛打南斯拉夫，最后输了零比九。零比三的时候，主教练把门将给换了，大家都很奇怪这是为什么，主教练赛后新闻发布会不肯说，说我明天告诉你们。

第二天他说了，是体育部的人要求换人的，他一个电话打过来，说你把门将给我换了，结果最后丢了九个球。对足球重视到了直接干涉主教练的地步。非洲喜欢这么干的国家领导人实在太多了。

尼日利亚 1994 年打入世界杯，几天后体育部长在电视台上向全国宣布解雇球队主帅、荷兰人维斯特霍夫。然后你猜发生了什么？军事政变，体育部长丢了权，维斯特霍夫被重新放到帅位上。1993 年尼日利亚大选，候选人提出了什么政纲呢？他说：“如果你们选我，那我就保证球队会打入世界杯。”

喀麦隆的米拉大叔打完 1990 年世界杯以后就说：最让他感动的那一刻，不是进球，而是在击败阿根廷后，比亚总统以及其他非洲国家元首跟他握手。当时已经三十八岁的米拉大叔是比亚总统“钦点”随队出战世界杯的，最后喀麦隆进了八强，比亚总统很开心，米拉大叔很开心，老百姓也很开心。

还有一件趣事：1993 年 10 月，反对比亚总统的喀麦隆反对派准备在 10 月 11 日召集一次总罢工。比亚的应对方案是什么呢：如果 10 月 10 日喀麦隆足球队能够赢得世界杯出线权，那么他就宣布 10 月 11 日是公众假期！

应该不光是独裁者或民粹领导人青睐足球的吧？

克韩：正面例子也是有的。比如说曼德拉。南非的黑人和白人靠什么走向和解和宽容？——足球、篮球、橄榄球，都是很重要的手段。曼德拉曾经专门去探望南非国家队队员，说“足球是最让人团结的一个因素”。足球也确实对南非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像伊拉克和阿富汗这样的国家，战后整个社会四分五裂，但足球是能让人暂时忘掉仇恨和冲突，让人觉得大家还属于一个整体的国家。伊拉克拿到亚洲杯冠军的时候，举国欢腾，阿富汗赢一场球，也是举国欢腾。

另外一个问题是，你独裁者可以利用足球，那我平头老百姓也可以利用足球啊。比如说，我选择哪支球队来追随，你不可能干涉了吧？这是极权社会少有的自由选择。再比如，在球场你可以骂娘，宣泄自己的情绪，而在其他公共场合，你要这么做就会受到威胁。



西班牙佛朗哥独裁时期，人民也敢怒不敢言，他们不可能公开喊“佛朗哥你这个刽子手”！但球迷可以在球场大声骂佛朗哥支持的皇马球员啊。加泰罗尼亚当时只剩下巴萨这个象征，佛朗哥也不敢对巴萨下手太过狠辣，因为他也怕。

就算在民主社会，政客其实也会利用足球的。

克韩：对。足球是政治家很好的竞选工具，喜欢足球的人太多了。你就教育问题说两句，媒体不一定报道，可能觉得你没有新意，你说几句和足球有关的，媒体立刻拥上来了，这对政治家提高所谓曝光度是很有好处的。

所以，英国议员只要有机会，都会表现一下自己对足球的喜爱。像英国前首相梅杰就说自己是切尔西球迷，但有人“揭发”他是披着切尔西球迷外衣的阿森纳球迷。过去的阿森纳球风比较沉闷，比分经常是一比零，场面不是很好看，有人就开玩笑说，英国首相绝对不能是阿森纳球迷。梅杰他就不敢承认自己是阿森纳球迷。

说到底，还是怕得罪选民。

克韩：布莱尔更聪明，他不说自己是曼联、热刺这些大球队的球迷，他说自己是纽卡斯尔队的球迷。为什么呢？因为纽卡所在的城市只有这么一支球队，全城都支持这支球队。而且喜欢纽卡不得罪人，别的队的球迷不会因为你是纽卡球迷就不投票给你。如果布莱尔说自己是曼联球迷，利物浦球迷会投票给他吗？

卡梅伦这两天最引人注目的亮相是什么？是呼吁国际足联对 2022 年世界杯进行重新投票，并且表示英国可以申办 2022 年世界杯。为什么呢？因为喜欢足球是最大公约数，在这个问题上站在人民一边是很讨巧的做法。他也声称自己是伯明翰当地另外一支球会阿斯顿维拉的球迷（和威廉王子一样），这样说，也不会得罪选民的多数。

巴西政客也是这样。总统获选人总是穿一件支持人数最多的球队的球衫去参加竞选活动。很多巴西人都表示，大选中投谁的票，往往要看世界杯的结果。

阿根廷前总统梅内姆是河床队拥趸。这有点问题，因为河床队比较富有，普通民众喜欢的是博卡青年队，是人民的球队。但梅内姆认为喜欢河床是个原则问题。怎么办呢？他说自己的女儿是博卡球迷。问题巧妙地得到了化解。

哥伦比亚总统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在巴西世界杯前专门联系给国家队名将法尔考做手术的医生。他说什么呢？大意就是，如果医生能把法尔考的身体搞定，那将会有助于他去赢得大选。

所以，民主社会也有很多政客通过表达自己对足球的喜爱，来体现亲民的形象。英国各个阶层都有大量的足球迷，只有少数所谓 upper-upper class 的精英人士对足球不感冒，他



们可能更喜欢马球、橄榄球，手握大量选票的普通民众都是喜欢足球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其实一开始不怎么喜欢足球，德国办了世界杯，她发现足球能给她拉来很多选票，而且她喜欢足球这件事会让大家都觉得很开心，于是她就顺水推舟地喜欢上了。专制社会也好，民主社会也罢，足球某种程度上都在被政客利用。

其实，政治家之所以这么喜欢利用足球，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平头老百姓实在太喜欢足球了。

克韩：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足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公开的表达渠道实在太少了。球迷在球场上可以公开表达某种愤怒，甚至这种愤怒还不是针对足球的。前苏联地区有一个研究显示，剧变之后，到球场看球的人少了。研究者有一个很有趣的结论说，除了经济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现在人们不需要到球场去发泄了，还有很多发泄的渠道。

另外，足球还是一项特别能让人产生阶级归属感和认同感的运动。就拿英国来说，足球在英国的政治光谱上是偏左翼的，属于产业工人阶层的运动。前面我也提到了，upper class，包括贵族，都是喜欢马球、橄榄球这些高雅运动的，普通产业工人就是看足球。实际上，英国的足球俱乐部对究竟是谁在支持他们很有自觉意识。从巴斯比到香克利都说过类似的话，大意是说，我们一定要踢出漂亮的足球来回报球迷，球迷每周六天都在工厂辛苦工作，到了周日才能看场球，他们想看点好看的，别打得太沉闷了，老是不进球，让人昏昏欲睡，球迷要不高兴的。英国很多教练，包括一些名帅在内，基本上都支持偏左翼的工党。只有少数俱乐部是偏右的，而且是极右翼，支持者是光头党，这样的俱乐部在东欧非常多。大部分情况下，足球还是左翼的运动。所以，撒切尔夫人去世的时候，英国足球圈的反应非常的冷淡。因为撒切尔夫人推行的右翼的政策，让很多矿山倒闭，很多工人失业，许多球员和教练的家人都受到了这些政策的冲击，他们对撒切尔夫人肯定是不会有好感的。

记得弗格森就曾经公开表示他对撒切尔夫人的不屑。

克韩：确实是这样。撒切尔夫人的很多政策，如果从右翼的角度来看，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确实也是起到了振兴英国经济的效果。而左翼更多地是站在个人遭遇的角度：我的父亲、兄弟因为这个政策失业了，我的朋友因为这个政策全家老小吃不上饭。每个人考虑问题的角度确实是不同的，足球既然是比较偏向左翼的运动，那么，英国足球圈对撒切尔夫人不感冒也就不足为奇了。撒切尔夫人去世后，英国足球圈流传的一句名言是：“我不会在撒切尔夫人的坟头起舞，但我也不会为她垂泪和默哀。”

说到足球跟政治，有个著名的例子：1998 年的世界杯小组赛有一场伊朗对美国的比赛，两国关系从德黑兰人质事件以后一直都很紧张，但是赛前伊朗队的队员主动献花，双方友好合影留念，成就一段佳话。还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例子？



克韩：其实，足球场上像这样促进友谊的时候少，倒是发泄恩怨的时候多。比如说荷兰和德国。1988 年欧洲杯，荷兰击败德国拿到了冠军。当时很多荷兰球迷就一起聚到阿姆斯特丹扔自行车。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纳粹当年占领荷兰之后，首先就把这个自行车王国的所有自行车都没收了。所以荷兰球迷一面狂欢庆祝一面喊：冠军是我们的，自行车也是我们的。

荷兰和德国的历史恩怨是很深的。像荷兰著名教练范哈内亨的爸爸、两个兄弟和一个姐姐都死在纳粹手里。德国后来逐渐正常化了，这种历史恩怨才慢慢地得到淡化。

1990 年 5 月 13 日，萨格勒布迪纳摩和贝尔格莱德红星队打一场比赛。克族人支持迪纳摩，塞族人支持红星队。当场引发了冲突。效力于迪纳摩、后来转会 AC 米兰的球星博班带头打了警察，因为比赛是全国电视直播的， 这让大家都意识到：克族和塞族必有一战了。直到现在，萨格勒布迪纳摩球场门口还有一组士兵雕像，旁边的碑文写着："致那些本队的球迷，是他们 1990 年 5 月 13 日在这里开始了对塞族的战争。"

就算伊朗和美国，也不过是当时缓和了一下，后来关系依然很僵。

最著名的那些战争，像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的战争，包括南斯拉夫内战，都有足球的因素在里面。不过有一个很神奇的足球促成和平的例子，卢旺达打内战的时候，连美国总统克林顿都摆不平，但因为 1994 年世界杯，内战暂时停止，大家先把世界杯看完。尼日利亚部族战争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当时好像是贝利要去当地访问，交战双方决定停战若干天，等贝利访问完了之后再打。先看球，内战回头再说。

足球也可以是融合民族的工具。

克韩：1998 年世界杯，拿到冠军的法国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法国队的阵容是这样的：拉马出生于圭亚那，安格洛马是瓜德罗普人，卡兰姆布是新喀里多尼亚人，德塞利祖籍加纳，维埃拉祖籍塞内加尔，图拉姆母亲来自瓜德罗普，齐达内父母都是阿尔及利亚人，德约卡夫的母亲是亚美尼亚人，博格西昂也有亚美尼亚血统，巴特斯的祖母是西班牙人，利扎拉祖有西班牙巴斯克血统，亨利和迪奥梅德的父母都来自瓜德罗普，皮雷有葡萄牙人的血液，特雷泽盖的父亲则是阿根廷人。

法国队的胜利对法国右翼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它证明不同民族、不同种族是能够融合在一起、取得优异成绩的。这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典范。

本届巴西世界杯也有一个民族融合的典范，就是比利时。比利时内部分成两派，一派是弗莱芒区的，一派是瓦隆区的。有这么一帮人，他们非常希望比利时分裂。如果比利时世界杯打得非常好，就证明了他们的失败，所以这些人就特别希望比利时在世界杯上不要走得太远，从而证明他们是正确的。



在民族融合方面，法国队和比利时队做得的确不错，荷兰队似乎就差一点，经常闹内讧。

克韩：这其实和荷兰的民族性有一定关系。我在这里再次推荐介绍荷兰足球的名作《美妙的橙色》（Brilliant Orange），里面讲荷兰人和英国人不一样。英国人是士兵民族，主教练说东不往西，这种人适合一起打仗，打仗有这样的兄弟，靠得住，心里很踏实；荷兰人是工匠民族，一个人一个主意，老是不服气，总在问主教练为什么。士兵是可靠的，艺术家不可靠。荷兰人是加尔文教徒，加尔文派教义可以忽略神甫，自己从读经中去体会上帝教义，所以这个鼓励争论。

正因为这样，荷兰人的更衣室老是出问题。其实，民族融合荷兰比法国进行得还要早，1988 年欧洲杯荷兰的冠军班底中，里杰卡尔德、古利特都和苏里南这块殖民地有关系。但荷兰就是一直闹内讧。鲍比•罗布森不是英国名帅吗？他去带埃因霍温的时候，发现他在更衣室说话没一个荷兰球员听他的，都要和他辩论，唯一服从他的，就是成长于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政权下的波佩斯库。

德国的民族归化做得也很成功，这主要是受法国成功案例的激励。德国人很多年来一直都拒绝归化球员，但是 1998 年法国队的成功，让德国人认识到归化球员是有很多人才的，现在的德国中场核心厄齐尔是土耳其裔，要是以前，他这种球员是很有可能被忽略掉的。德国的殖民地不像法国、荷兰那么多，它吸收的归化球员主要是主动移民到德国的人，比如土耳其人和波兰人——现役国脚波多尔斯基就是波兰裔。这对德国队的实力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文章来自共识网，原文刊于《上海书评》。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大卫•戈德布拉特：“政治足球”出路何在？



足球评论员、《足球王国：巴西足球史》一书的作者

“

政治精英试图重新构思他们的国家。为了与以往的殖民地历史形成对比，他们试图将本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城市化、受欢迎的国家——事实证明，足球能帮他们向这个目标迈进。在巴西，热图利奥•瓦尔加斯(Getúlio Vargas)总统以体育场为讲话平台来向大众宣布新劳动法。在阿根廷，胡安•庇隆(Juan Perón)总统兼任国家体育局长，他的形象还出现在写有“庇隆：第一运动员”的海报上。

”

作为一名热情的业余足球运动员，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即将转为职业球员。这位玻利维亚总统已与圣克鲁斯省(Santa Cruz)省会圣克鲁斯市的小球队“瓦尔内斯体育生”(Sport Boys Warnes)签约，只领最低工资。看样子，莫拉莱斯即便有机会上场，也只能撑个 20 分钟，但他毕竟已是 54 岁高龄了。

实际上，莫拉莱斯的年龄是这则新闻中最令人惊讶的地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并不是第一位将政治与足球结合起来的拉美国家总统。上世纪 70 年代，巴西的埃米利奥•梅迪西将军(General Emílio Médici)试图亲自挑选国家队的球员人选。而作为阿根廷“第一夫人”，伊娃•庇隆(Eva Perón)曾脚穿高跟鞋为比赛开球。

（文章来自 FT 中文网，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完整文章。）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究】

陈鹏：国际足联为何对政府说“不”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南非世界杯期间，国际足联再显“大佬”本色：先是警告要彻查本国足球堕落真相的法国政府不得介入足球事务，足球理应交给足协全权打理，后是彻底推翻尼日利亚总统颇显悲壮的两年禁赛令，毅然决然表明足球事务还得交给本国足协，即使总统也无权干涉足球内政。国际足联何以牛气冲天、敢对各国政府说“不”？”

作为“超国家主体”，国际足联对足球经济的垂涎以及攫取到手的巨大利益才是它不断强势的重要动机。

南非世界杯期间，国际足联再显“大佬”本色：先是警告要彻查本国足球堕落真相的法国政府不得介入足球事务，足球理应交给足协全权打理，后是彻底推翻尼日利亚总统颇显悲壮的两年禁赛令，毅然决然表明足球事务还得交给本国足协，即使总统也无权干涉足球内政。国际足联何以牛气冲天、敢对各国政府说“不”？

法国足协主席埃斯卡莱的请辞风波率先遭到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发难，他强调国际足联章程明确绝不允许政治干预足球，否则国际足联不会袖手旁观。“在法国，足球已经成为一起国家事件，但它应该由足协来管理。一旦我们发现政府干预其中，我们将对法国足协提供帮助。”几天之后，对国家队表现大为不满的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颁布禁令“废黜”国家队两年，7 月 2 日，国际足联“通牒”尼日利亚，限其 48 小时内改变决定。7 月 7 日，尼政府最终服软。

国际足联已经不是第一次对各国政府说“不”了——2001 年禁止几内亚足协参加一切国际比赛，同年 7 月封杀黎巴嫩，2004 年停止危地马拉足协一切工作，2006 年中止希腊足协权力，差点对葡萄牙实施全球禁赛，封杀肯尼亚、伊朗和科威特，2008 年取消伊拉克北京奥运会资格……一句话，只要你不按章办事，国际足联就有十足理由把你“办了”。



国际足联的强势首先缘于足球这项运动的巨大影响力。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参与者超过2.4亿，国际足联自1904年成立以来就致力于促进足球运动的发展；通过组织各级比赛及其他手段发展协会会员、官员和运动员之间的友好往来；贯彻联合会的章程、代表大会决议和比赛规则。目前204个国家和地区足协均受国际足联的领导和章程的制约，在100多年发展历程中，能清晰看到足球的影响力通过世界杯这样的顶级赛事持续深入。

通过国际足联几代人孜孜不倦的努力，足球技战术流派的此消彼长、足球巨星的潮起潮落、足球赛事的日趋激烈已经形成深刻、永恒的足球文化，这也为百年来各大洲国家的发展渐变或一体化进程提供了最有力的注脚，更成为当代人类生存境遇和国家形象的绝妙隐喻，同时，这项运动也以其不可替代性成为消除种族歧视与差异的最佳途径。比如当今足坛的球星们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他们肤色、信仰、种族各不相同，但在各大联赛之间毫无界限地转会、交融，这种无限制的沟通合作、彼此借鉴、抑制和反抑制都是这个时代最诱人的体育与文化话题之一。

云南省足协主席常林认为，国际足联自阿维兰热时代起就逐步确立了世界杯至高无上的权威，赛事的整饬、纪律的严苛、制度的完善都是推动世界杯不断发展的重要保障，国际足联居功至伟。“没有任何一个单项运动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堪向国际奥委会叫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它。”

作为非官方机构，去政治化是国际足联的目标之一，但作为“超国家主体”，国际足联对足球经济的垂涎以及攫取到手的巨大利益才是它不断强势的重要动机。如金融危机横行的2008年，国际足联收入总额反而高达9.57亿美元，实现盈利1.84亿美元，其中94%来自于世界赛事的电视转播权、市场营销和签署的合作伙伴合同。此外，国际足联还从自有资产管理中获利1600万美元。

让足球变成赚钱机器始于阿维兰热执政时期的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有8家公司首次成为正式合作伙伴并支付了几百万美元。此后商业化趋势愈演愈烈，门槛费越来越高。据悉，今年南非世界杯正式合作企业都需交纳史上最高的6500万美元才有资格成为“伙伴”。商业从未像今天这样无所不在，几乎侵入赛场每一寸草皮，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就说，本届世界杯足足能赚32亿美元。

当然，国际足联的巨额收入也支付给各参赛球队和国家足协，本届南非世界杯的奖金较上届增加了60%，总奖金数达4.2亿美元，冠军球队将得到3000万美元，像朝鲜队这样的小组赛被淘汰球队也有800万美元进账。此外，为保证32强备战，世界杯开始前半个月已提前将100万美元打入各国足协账户。今年国际足联还首次对俱乐部进行补偿，总金额为4000万美元，任何一家俱乐部只要有球员参加世界杯，该俱乐部将得到每名球员每天1600美元的补偿……



而在一些人看来，国际足联在“通牒”各国政府时远未一碗水端平。本届世界杯法国、尼日利亚事件披露后，一些网民纷纷质询国际足联为什么不对中国说“不”：中国足协是不是实质意义上的政府分支机构？它的资金来源是不是政府税收？政府官员或相关机构能不能、有没有干预足协的事务？……真要按国际足联所谓的铁律办事，中国恐怕早被禁赛几十年了。

显然，国际足联采用了双重标准。像法国这样有着“政教分离”传统的西欧国家，政治干预足球的界定相对简单，但在非西方国家就大不一样了。说到底，国际足联当然不至于蠢到将自己的孩子一拳打倒或干脆赶出门去，更不会眼睁睁看着它身后巨大的市场而无动于衷。

这次国际足联的冲天牛气让不少人反感——足球毕竟不是空中楼阁，哪有完全脱离本国土壤独立发展的道理？法国政府至今就态度强硬，双方还没个最后结果。但还是应当看到，国际足联坚持原则、不容政治干预足球的难能可贵，体育本身的纯洁性和相对独立性有时格外重要。

文章来自《瞭望新闻周刊》。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经济学人》：美丽的运动，肮脏的交易

The Economist

“

世界杯即将开赛之际却见疑云重重。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根据所获材料披露：卡塔尔通过贿选获得了 2022 年世界杯主办权。若情况属实，不正当竞争也非此一件。据足球管理机构国际足联（FIFA）报告，2010 年世界杯的多场表演赛涉及作弊假球。和往常一样，无人因此受罚。

”

欣赏利昂内尔•梅西出神入化的魔术脚法和 C.罗健美矫捷的优雅身姿都可称乐事。但作为坚定不移的国际主义者，本报认为足球运动真正的魅力在于它遍及全球、无分地域的影响力。没有任何一项运动像足球一样借着全球化的东风繁荣发展。巴西世界杯将于 6 月 12 日开幕，届时，全球约一半的人口都将观看世界杯的部分赛事。

然而，世界杯即将开赛之际却见疑云重重。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根据所获材料披露：卡塔尔通过贿选获得了 2022 年世界杯主办权。若情况属实，不正当竞争也非此一件。据足球管理机构国际足联（FIFA）报告，2010 年世界杯的多场表演赛涉及作弊假球。和往常一样，无人因此受罚。

这只是引发了更多质疑。为什么竟然会有人支持在阿拉伯的仲夏举办世界杯？为什么在采用裁判判定复查技术方面，足球远远落后于橄榄球、板球和网球这样的运动？为什么全球最流行的运动交由这样一群庸才管理？特别是自 1998 年起就任世界足联主席的赛普•布拉特，更是庸才之首。若其它组织屡爆经济丑闻，领导人早就会被免职开除，而布拉特却忝位至今。除此之外，他还无可救药地与时代脱轨，他发表关于女性的性别歧视言论，打断悼念曼德拉的一分钟默哀，78 岁高龄的他就像是 20 世纪 70 年代公司董事会中男权至上的恐龙型领导人。即使布拉特谋求连任五届的计划遭到米歇尔•普拉蒂尼的阻碍，我们也难以感到振奋宽慰。虽然普拉蒂尼曾是出色优秀的中场球员，欧洲足球的领军人物。但可悲可叹，他却为卡塔尔申办世界杯背书。

欺骗贪腐的流氓？天下乌鸦一般黑！



许多足球爱好者对此漠不关心。他们所关注的是足球这项美丽的运动，而非那个运营管理足球的老旧机构。而且说到道德沦丧，并不是只有国际足联一家。毕竟国际奥组委也在决定 2002 年冬奥会举办城市时传出过和卡塔尔贿选类似的丑闻（虽然他们更努力地撇清嫌疑）。一级方程式赛车（F1）掌门人伯尼•艾克莱斯特在德国受到受贿指控，而美国篮球刚刚因为种族歧视言论解雇一位球队老板。作为世界第二大流行运动的板球也有假球传闻。美式足球则有无数的受伤索赔需要处理。

这些都会造成不良影响和损失。首先，管理层的腐败自满增加了打击假球的难度。现在，赌球下注的资金数额越来越巨大 — 世界杯的一场比赛的下注资金就可能有 10 亿美元之巨。迫于外部压力，世界足联最近引进了一些优秀人才，比如受人尊敬的道德管理大师马克•皮埃斯。但是一个惟布拉特马首是瞻的机构又怎么会听得进关于改革的说教呢？

第二， 重大腐败事件坏处多多，即使选定了举办国,贪腐也会持续带来损失。能够去贿赂足球官员的不义政权通常视重大运动赛事为骗取国家财富的机会，比如把巨额工程承包给裙带关系。这样一来，本应举国庆祝的赛事会沦为贪污受贿的盛宴。

第三，高昂的机会成本。足球运动虽然全球盛行，但仍有发展空间。全世界最大的三个国家：中国、印度和美国，都还没有被足球征服。美国有踢球的，但缺少看球的。中印恰好相反，有热情的球迷，却踢不好球。中印两国此次都无缘巴西世界杯（历史上只有中国曾晋级过世界杯决赛）。

国际足联认为三大国对足球不温不火主要归结于各自的历史、文化和已有运动的强势，比如板球在印度就非常流行。但现在足球正在得到普及和发展：美国的第一批足球爱好者如今已为人父母，正把自己对这项运动的喜爱传递给下一代。但这也显示出国际足联的不理智，居然选择卡塔尔而不是美国作为世界杯举办国。一个贪污腐败的国际足联也很难赢得从心底里憎恶中超腐败和假球的中国年轻人的信任和喜爱。

如果没有布拉特

布拉特能离职固然是好，但治标不治本。虽然国际足联是瑞士的一个非盈利机构，但却缺乏监管。有资格对其进行监管的国际或区域性足球组织都需要依靠它的资金。由于行业准入门槛高，出现竞争机构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国际足联对国际足球运动拥有先天的垄断。像这样的机构理应受到约束，但国际足联却对监管说不。

虽然如此，仍有可为。瑞士应该要求整顿国际足联，或者停止对其的税收优惠。国际足联的资助者也应参与进来，遏制腐败，推动采用新技术：启动对每一次判罚的即刻视频回放。

最难啃的硬骨头是世界杯主办国的选择流程。一个解决方案是把世界杯固定在一个国家：但这样一来主办国球队会享有绝对优势，而且在不同时区移动举办是对世界杯有利的。另



一个经济又明智的办法是把主办权交给每一届的冠军国，依次类推，获胜国可以选择八年之后主办，也可以把主办权拍卖，出价高者得。这可能有些偏向足球强国。但考虑到这些国家大多数有现成的足球场，这样可以减少浪费－还能进一步激励它们夺冠获胜。

可惜的是，足球爱好者不是讲逻辑的经济学家而是浪漫的爱国主义者－所以我们的建议被采纳的希望还没这次英格兰夺冠的机率大。一个合情合理的措施是正式规定轮流主办，比如欧洲、非洲、亚洲、美洲的国家轮流主办，这样至少可以遏制洲际腐败。但如果国际足联的高层不改革，实现轮流主办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

原文来自《经济学人》2014 年 6 月 7 日刊，译文来自译言网，译者：美妙绝伦猪。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田磊：足球溃败的警示

《南风窗》记者

“2004 年那场风波之后，中国足球基本上也就跌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不少球员、教练、裁判、俱乐部经理、足协官员最大的精力都用于如何从这块日益萎缩的蛋糕中抓紧分肥。作为生产者的球员和教练，分肥的方式是参与赌球，制造假冒伪劣比赛，以此获利；作为销售者的俱乐部则是积极组织造假、参与贩假；作为“司法机构”的裁判管理委员会及其领导的众多“金哨”、“银哨”，则彻底将承担监督责任、维护公平的“哨声”出卖用于谋利；而作为党组派到足协领导这些裁判、俱乐部和球员的谢亚龙、南勇们则利用党赋予的权力收受贿赂。中国足球官商一体的运行模式诞生的是最坏的市场化和最无效的管制。市场化的中国足球一步步由辉煌走向溃败的历程当能给予人们更多的警示。”

从去年 10 月至今，中国足球的反赌风暴持续了将近一年，其间百余人被调查，30 多人被逮捕，从球员、教练、裁判、俱乐部经理，到足协主席、副主席等一众官员，参与足球运动的各个角色，无一幸免，随着先后两任足协主席谢亚龙和南勇被逮捕，反赌也已彻底演变为反腐败。

（文章来自《南风窗》2010 年第 22 期，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完整文章。）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策】

王润斌 姜勇 ：国际足球政治的潜规则与治理之道——评安德鲁·詹宁斯的《FIFA 黑幕:国际足联的贿赂、选票操纵与球票丑闻》



王润斌，南昌航空大学副教授；姜勇，大连理工大学教师

“安德鲁•詹宁斯的《FIFA 黑幕：国际足联的贿赂、选票操纵与球票丑闻》全面、深刻揭示了国际足球政治危机背后的潜规则乱象。高度集中的权力、个人敛财欲望、利益群体非对称性较量、法律制裁不力等是潜规则的成因。严格控制营利性行为、合理化分配资源权益、加快民主法治进程、强化媒体舆论监督、尝试全球治理实践等是国际足球政治变革的必由之路。”

“安德鲁•詹宁斯这辈子只做一件事，那就是追击坏蛋”。詹宁斯的工作始于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报》，他的 2 本书《五环贵族》以及《新五环贵族》对国际奥委会的腐败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评。“我调查过贪污的警察、腐败的政府和职业罪犯，因为对英国与伊朗的秘密关系的调查揭露丑闻及骗子警察而获过奖。在 40 岁的时候，我开始把目光转向体育界。” 2006 年，詹宁斯把对国际足球政治潜规则的调查成果汇聚成书《Foul! The Secret of World of FIFA：Bribes，VotedRigging and Ticket Scandals》，震惊世界体坛。著名足球评论家颜强 指出：“他用了差不多 10 年时间，来调查国际足联的幕后丑闻……一幕一幕将各位国际足联大佬拖上舞台，然后一个又一个地剥下他们身上荣耀的幡羽，辛辣的嘲讽、无情的鞭笞。”这本解密国际足球政治潜规则的作品曾被布拉特诉诸瑞士法院，请求在全球范围内禁止出版发行。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书随后被翻译成 15 国文字，广为流传。2010 年 3 月，上海译文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了中文版《FIFA 黑幕：国际足联的贿赂、选票操纵与球票丑闻》（以下简称《FIFA 黑幕》）。



《纽约时报》评论："一直以来，像国际足联、奥委会这样大型的非政府组织，其内部的权力结构和决策透明度，常常与他们所推崇的公平、公正的体育精神相去甚远。这本书，很好地解释了这一奇怪的现象。"这种奇怪的现象，用中国学者吴思 的历史逻辑来判断，即国际足球政治的潜规则在作祟。吴思透过历史表象，揭示出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实际上支配着社会运行的不成文的规矩，并将其名之为"潜规则"。在詹宁斯的书中，国际足球政治领域显然也存在着这样的潜规则乱象。

1 国际足球政治潜规则

1.1 钱权交易

詹宁斯在《FIFA 黑幕》中揭露了 ISL 公司在获得了 2002 和 2006 年世界杯营销和转播代理合同时，没有将 100 万瑞士法郎的回扣打给某位高官，而是直接转到了国际足联的账上。ISL 公司是阿迪达斯的子公司。詹宁斯在《五环贵族》中提到，布拉特在 1972 年到国际足联赴任之前曾在阿迪达斯兰德斯海姆的总部接受了培训。"阿维兰热绝不会忘记，他身边的秘书长布拉特是一个由达斯勒挑选，效命于阿迪达斯公司的'自己人'。而布拉特本人对此也铭记于心，作为一名体育官员，他的政治前途已经与阿迪达斯的三叶草商标紧紧地捆在了一起" 。《FIFA 黑幕》提到，1995 年，美国的体育市场营销公司 IMG 就盯上了世界杯的营销权，然而 IMG 当时天价报价丝毫没有打动国际足联，反而处处受制于国际足联。在布拉特的一手操控下，IMG 在开标前 27 天才得到 2002 与 2006 年两届世界杯打包销售的消息，根本没有时间重新估算报价与寻找银行担保。IMG 欧洲区董事长德罗萨尔向布拉特表示抗议："赛普，我断定，整个竞标过程中其实存在着双重游戏规则，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可能……你对于我们努力的回应只是装装样子，只是为了使国际足联将来免受不公平与不正当竞争的指控。"ISL 公司最终中标，也有了 100 万瑞士法郎回扣的出现，布拉特不得已悄悄地绕过财务委员会处理了这笔款项，巧妙地掩盖了权钱交易的行为。

1.2 选票之争

选举作为一种政治实践，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和特征，而这种特征要能真正融入民众的政治生活并正常运作，必须以一定的公共领域及在此之上所展开的公开而合法的政治营销为前提。 这种竞争性的政治营销正体现了民主的内在品质，然而当候选人采用所谓贿选以取得选票或改变选举结果时，民主与公平往往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在国际足联若干领导职位的选举与世界杯举办权的选举中，贿选与选票交易的丑闻屡被曝光。

2010 年 10 月 18 日，英国《泰晤士报》曝光了国际足联执委在世界杯申办拉票过程中的索贿丑闻，国际足联立即展开调查，并对 2 位涉嫌的执委停职。2010 年 11 月 29 日，BBC《全景》节目又披露里奥兹、特谢拉及哈亚图等高级执委曾经接受重金贿赂。在 2011



年 5 月 10 日的英国议会听证会上，前英国足总主席特里斯曼指出，至少有 4 名国际足联执委涉嫌向英格兰世申委索贿。特里斯曼表示，国际足联副主席杰克•沃纳最先向自己提出了“给钱”的要求，索要的数额达到了惊人的 250 万英镑。除了沃纳，巴拉圭籍的 FIFA 执委莱奥兹更是狮子大开口，此人向英足总索要的竟然是英格兰的皇家爵位。相比之下，巴西籍执委特谢拉则要“含蓄”得多，他对特里斯曼暗示说：“过来谈一下你能为我提供些什么。”泰国人马库迪要求英格兰国家队和泰国国家队进行一场友谊赛，转播权由他控制。英格兰为 BBC 曝光国际足联的潜规则付出了代价，2 票的得票率把国际足球政治的现实与残酷演绎到了极致。

《FIFA 黑幕》还揭露了杰克•沃纳在 1996 年的选举中找人冒名顶替海地委员基斯投票，1998 年为了支持布拉特打败约翰松，他又让朋友内维尔•弗格森再度顶替缺席的基斯委员。詹宁斯从时任非洲足联主席的法拉赫•阿多那里采访到了更令人震惊的内幕：“他们要塞给我 10 万美金，让我将票由约翰松改投布拉特……其中一半是钞票，一半则是折算成足球装备送给我国。”

而拒绝带来的后果就是阿多在 1998 年国际足联会议的登记证遭到了篡改而最终无法投票。在 2006 年世界杯申办投票前，为了得到非洲 50 余票的支持而又不得罪阿迪达斯与基尔希财团及其背后的欧足联势力，布拉特选择了秘密地同时支持南非与德

国，由于新西兰委员邓普西的弃权导致南非在第三轮投票中以 11∶12 败北。据邓普西说，他受到了来自欧洲财团的巨大压力。而德国为了获得亚洲的选票，不惜改变出口武器的政策向沙特提供 1 200 枚反坦克导弹。显然，为了选票，各种各样的交易在国际足球圈内不断进行。

1.3 球票丑闻

《FIFA 黑幕》还揭露出个别国际足联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大量订购门票并大肆抬价售卖的丑闻。2002 年，时任国际足联秘书长的鲁菲南揭露了哈曼将自己通过特权购买的世界杯门票再倒手卖到黑市牟取暴力的事实。鲁菲南透露说，哈曼(原亚足联主席)以个人的名义购买数十张世界杯紧俏门票，例如英格兰队与瑞典队的比赛、英格兰队与阿根廷队的比赛等等。细心的鲁菲南记下了球票的序列号码。哈曼因此受到了国际足联的警告。2006 年德国世界杯期间，国际足联执委会成员，来自博茨瓦纳的伊斯梅尔•本哈杰因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倒卖 12 张足球门票，被国际足联遣送回国，解除一切有关世界杯的职务。伊斯梅尔•本哈杰坦白说：“我曾将 12 张 2006 年 FIFA 世界杯第 1 轮英格兰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比赛第一档次门票以每张 300 欧元的价格出售，这一价格比票面价格高出 200 欧元。我对于这一错误行为感到深切的悔恨。”



国际足联所有执委都有权在小组赛每场比赛各购买 10 张门票，第 2 阶段则可以每场比赛购买 5 张门票，虽然这是国际足联规定，但是几乎每个执委购买的门票都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在 2006 年德国世界杯开赛之前，国际足联副主席杰克•沃纳的儿子达里安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拥有一家名为星普尔的旅行社，他利用父亲职务之便，得到大量门票，再通过这家旅行社大肆倒卖门票牟取暴利。但杰克•沃纳和达里安仅仅接受了国际足联调查小组的询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也最终不了了之。在詹宁斯看来，这样的结果不过表明了球票交易背后隐藏着国际足联与球票代理机构之间不成文的利润分成的潜规则罢了。

2 国际足球政治潜规则的成因

2.1 权力的高度集中

国际足联是典型的国际非政府体育组织，《国际足联章程》在形式上按照传统非营利组织的领导决策方式进行制定，即突出理事会制度与秘书长的职责。“执委会是国际足联的执行机构，秘书处是国际足联的行政机构”。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国际足联主席的权力过于集中，而且布拉特本人善于将自己的亲信安排在执委会或核心专业委员会等重要部门中，以便在决策中形成有利于自己的投票结果。青木昌彦把这种行为称之为“内部人控制问题”，是指独立于所有者(外部人)的经理人员掌握着组织的实际控制权，在组织运行中充分体现自身利益，甚至与下属“合谋”谋取各自的利益，从而架空所有者的控制与监督的情形 。

布拉特上任之初，就试图削弱秘书长权力、架空秘书长鲁菲南，“国际足联实际上有了两套行政班子：其中一套由名义上的秘书长鲁菲南主持，另一套职能相同且有挑战意味的班子则由‘隐形’的秘书长热罗姆•尚帕涅领导……布拉特和他的精干队伍决定着国际足联的所有事情。有时鲁菲南会列席核心集团的会议，但他并不受欢迎，布拉特集团就想从他手里把权力一把夺走”。 2002 年，因卷入哈亚图与布拉特争斗，鲁菲南被剥夺秘书长职务，布拉特亲信林西任秘书长兼财务总监。与此同时，格隆多纳被安排做财务委员会主席，沃纳做了副手，俄罗斯委员科洛斯托夫被安排做国家足协委员会主席。权力高度集中且缺乏有效的监督只能导致在“市场开发权的委托代理”等重大事务决策中，国际足联内外利益团体利用规则漏洞并通过私人关系来实现小团体利益，最终损害了作为非营利组织的国际足联的公共利益。

2.2 徇私敛财的欲望

前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离职时，曾感慨：“当我继任主席席位时，国际足联账上只有可怜的 20 美金。现在我可以自豪地宣布，事情已经大为不同了。我将笑看 4 亿美金的支票而离开了。”



的确，国际足联通过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开发获得了巨大成功。1994 年美国世界杯，际足联获得 9 600 万欧元收入，而 2010 年南非世界杯已经给国际足联带来了近 32 亿美元的收入。国际足联 2007~2010 年的财务报告显示，国际足联的总资产已经达到 41.89 亿美元。Eisenberg 研究了国际足联的商业开发轨迹后指出："国际足联希望保持住这种盈利水平和运动的长远发展，需要格外注意自身民主决策体系。"然而遗憾的是，诱人的世界杯收益因国际足联不够透明的决策与分配体系被某些商人和官员大肆攫取。

经济学家布坎南认为，每个经济人都具有理性，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具有自利性。《FIFA 黑幕》披露国际足联重要官员不仅从国际足联获得高额工资，还享受到了全方位的私人服务："国际足联财政部门为领导层的每一位官员都保管着一个私密帐户，他们的差旅费、招待费、世界杯球票开销，乃至个人支出都可以从这个秘密账户走。他们不用费心保存收据、酒店和餐馆的账单、信用卡结帐、航空公司的发票，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提出报销"[2]99。除了个人欲望获得满足外，国际足联高官们还为身边的其他人谋取利益。2009 年，接替 ISL 获得 FIFA 商业开发合同的 Infront 公司的 CEO 名叫菲利普•布拉特，是布拉特的侄子。这家公司成立时间不长，却获得 2010 年世界杯电视转播代理和市场开发权，还持股一家英国的 Byrom 公司，负责南非世界杯商业球票发售。正如有学者批评的那样："他们只是把足球当做营生乃至牟取利益的工具，对个别足协官员来说，更将足球比赛演化成政治化的商业活动，甚至把足坛当做升官发财的捷径。"

2.3 利益群体非对称性较量

2006 年，德国世界杯组委会最后公布的账目显示，德国世界杯盈利 2.06 亿美元，税后利润 1.45 亿。德国权威报纸《图片》报的调查数据显示，世界杯为整个德国带来了约 200 亿美金的收益。丰厚的回报让世界杯主办权竞争变成了多家利益群体博弈的舞台。"2018 年和 2022 年世界杯足球赛主办权的争夺正变成一场全球性的竞争……大概有来自 4 个大洲的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希望举办这一世界最大规模的单项体育赛事。到 2010 年 12 月国际足联执委会投票表决时谁会成为赢家，这一悬念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次"。

在利益群体博弈中，作为决定权的国际足联明显带有绝对的主导权，这是一场信息不对称的较量。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市场中卖方比买方更了解有关商品的各种信息，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可以通过向信息贫乏的一方传递可靠信息而在市场中获益。 现实中交易各方信息不对称具有普遍性，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会引发各种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从而使互利互惠的交易难以进行，造成帕累托最优无从实现。机会主义行为的典型表现就是寻租行为的发生，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自由竞争的经济体，因而各种要素所有者和公共资源掌控者势必会实施一些垄断措施，以阻止要素的经济租金流失，租的产生由此引发出寻租活动。



在世界杯的申办中，寻租设租的潜规则也存在着，英国媒体对卡塔尔世界杯贿选的揭露并导致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对哈曼等人的调查就说明了这一点。

2.4 法律体系存在漏洞

“从体育法角度来讲，国际足联缺乏必要的监督和管理，最主要原因是国际足联的身份非常特殊，它是一个民间组织，这就可以让它躲过很多监管”。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专家张笑世说，“如果要对国际足联进行监察，就一定要依靠所在地的司法部门。”

当 BBC 在 2010 年底控诉国际足联与 ISL 公司的金钱交易时，国际足联迅速发出了回应，认为这些事关 ISL 的问题要追溯到很多年前，瑞士楚格州刑事法庭在有关 ISL 的案件中，没有判定任何国际足联官员有罪。楚格法庭的调查结束后，瑞士另一家小法庭重新调查 ISL 案件，他们确认国际足联官员曾经收受 ISL 公司的黑金，由于涉案人员中没有瑞士公民，随即放弃了深究。根据瑞士法律，国际足联是非营利国际组织，并不会受到瑞士腐败法的约束。国际足联缴纳了 350 万英镑的罚金，庭外解决了问题，并要求对方不要对外透露受贿国际足联官员的名字。另外，国际足联还强硬规定，足坛的内部问题，只能在内部解决，不得提交给当地的司法机构。他们甚至利用足球的巨大影响力，去制裁那些试图挑战其权威的国家。1997 年，阿维兰热发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通牒：如果巴西政府要追究巴西足协的腐败问题，国际足联将开除巴西的会

员资格。 更为严峻的局面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目前还没有针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法律体系，难以对跨国性贿选、投机活动的国际足联等国际行为体及成员进行有效的监管与制裁。

3 国际足球政治潜规则的治理

3.1 营利性行为的调节控制

非营利组织必须是非营利性的，这种公益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像企业一样以追逐利润为目的；又因为它的民间性，决定了它也不能完全依靠国家财政支出，往往把营利性行为作为重要的资金来源渠道。只要不把营利收入用来分红，“从理论和实践上看，允许非营利组织开展营利活动与其宗旨或法律定位并不冲突，而且这也是国际上的普遍做法”。 然而，由于非营利组织享受免税或减税的待遇，像国际足联这样的非营利组织往往利用制度的缺陷获取更加可观的利润。

西蒙•库珀所说的世界杯不再经典，也正是意指国际足联正在变成一个惟利是图的跨国企业，而在这样的企业中，不会再有充满灵感和即兴发挥的表演，一切都将按部就班——最大化的利润是关键。



因此，必须借鉴其他非营利性国际组织经验，对国际足联的世界杯营销、无形资产开发等行为制定并严格执行适当的附加规制，如统一明确组织开展营利活动的空间和限制条件，国际足联及代理机构、下属机构必须开展与其目的宗旨有关的营利活动；健全财务制度，对不同收入分类建账，将全部营利收入或相应比例用于公益事务，瑞士政府也能够对国际足联的营利收入进行适当的税收调节等；各国家也能够逐步建立相应的税收调节制度，从而建立国际足联从事营利活动的特殊规则，避免因为显规则的漏洞而发生钱权交易的潜规则。

3.2 资源权益合理分配

布拉特曾经说过，一些欧洲大牌足球俱乐部把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最好的球员给挖走了，这种作法就像新殖民主义者一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南非获得 2010 年世界杯主办权时，伦敦卡斯商学院的茨曼斯基教授受邀为南非组委会制定营销方案。在他看来，国际足联存在的种种垄断做法就是殖民主义，南非政府接受了国际足联获得世界杯 75%营销权益和收益的条款，也就意味着国际足联已彻头彻尾地成为与东印度公司一样的寡头。开普敦大学的学者苏菲•纳库艾拉认为，南非世界杯实质上是南非国家主权的沦丧："在国际足联或者国际货币基金会承担的所谓项目中，不发达国家的主权早已遭到粗暴的侵犯。为了不可预知的发展和利润，他们放弃了太多已经可以确定的权利和收益。"

虽然两位学者的结论过于极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国际足联通过世界杯主办合同、世界杯营销方案等权力垄断的行为，牢牢地占据着资源权益分配的"食物链"顶端，而那些处于底端的利益团体必须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通过潜规则的手段来获取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利益。要打破这种资源垄断与权益分配不公的局面，就必须增加主办城市在世界杯收益中的分配份额，增加发展中国家足协在国际足联物质、技术、人员援助中的比重，增加亚非国家在国际足联的席位以及执委会中的席位，尝试国际足联主席的竞选改用各大洲

主席轮换制以限制欧洲国家的中心地位、削减其统治

性势力范围的做法。

3.3 加快民主法治进程

英国学者阿克顿曾言："权力产生于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显规则中的大量自由裁量权和程序规划中的可弹性操作为公共权力场潜规则的运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詹宁斯曾说过布拉特不会退休，他必须保持这个星球上最具权势体育人物的地位，一直干到殡仪馆来人把他的尸体用黑色袋子装走为止。在 2011 年的竞选纲领中，哈曼大胆地提出了将国际足联主席的无限制任命期限更改为 8 年的建议，却因为一场来自布拉特的控诉



而夭折。因此，对国际足联而言，首先要打破的是主席的终身制与特权制，增强主席等领导者的责任意识，建立委员和媒体的问责制度、推行引咎辞职制度、推行主席薪金与财务公开制度。此外，必须完善民主集中制，进行民主决策、科学管理，打破执委会等核心权力机构中的利益小团体，还要进一步扩大非洲、亚洲等地区足协的话语权，逐步削弱欧洲中心主义的利益团体实力。更要全面完善法律法规，补充显规则的不足。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减少法律法规的模糊性，消除盲区，特别是国际足联主席、执委、委员选举以及世界杯主办城市的投票必须推行更加公开透明的制度，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自由裁量权。严厉制裁违反规则的国际足联官员，提高利用潜规则的成本，遏制潜规则的发生。

3.4 加强媒体舆论监督

国际足联对有正义感的媒体、敢于揭露潜规则的詹宁斯们采取了打压政策。布拉特曾经在记者发布会上斥骂：“当今社会充满着恶棍，这些恶棍也在足球圈里存在着。我们必须同那些控诉 FIFA 的人展开战斗，他们必须受到惩罚。”

詹宁斯被禁止参加国际足联以及其下属各大洲足联的所有活动。国际足联曾经在 2003 年和 2005 年 2 次起诉詹宁斯以及《每日邮报》，最后的调查结果，除却一些细节出入外，法庭认为被告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起诉也就只能以败诉告终，而且 2 次起诉的法庭庭审费用，最终都得由国际足联承担。白岩松曾经提出了“媒治”的概念，即当今社会问题通过媒体曝光、监督、批判得到治理的一种方式。

有学者认为“媒治”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传媒及其报道能够一贯地正确，并永远地做到公平正义；二是传媒的监督可以被有效地落实或执行。通过 BBC 曝光、揭露国际足球政治的潜规则及其效果来看，起到了媒体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而且 BBC 也较好地坚持了正确的价值导向、树立了坚固的公信力体系，“总的看来，在曝光国际足联丑闻事件中，BBC 自始至终所体现出来的就是公共利益至上的原则，这一原则也是其公信力体系得以构建并延续的表征”。在如今商业竞争日趋激烈的状况下，批判力、公正性依然是媒体最有价值的内在品质，只有更多的媒体始终秉承秉持这样的品质，国际足球政治的潜规则终究会被曝光。

3.5 全球治理实践的尝试

俞可平指出：“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毒品、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国际足联对赌球等具有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也有过多边主义合作的先例。国际足联在 2011 年 5 月 10 日对外宣布，国际足联已经与国际刑警组织达成协议，双方将密切合作打击国际足球比赛中出现的假球，为此国际足联将为国际刑警组织提供 2 000 万欧元的专项资金。布拉特



表示国际足联主动伸出手寻求帮助标志着一个历史性时刻："同官方和警方合作来对抗那些想要摧毁比赛的人对我们来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全球治理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伴随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而出现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的共同特点是其跨国性和"非领土性"，单靠一个国家难以对其进行有效控制和解决。国际足球政治潜规则的发生也带有跨行业性、跨国家性、跨区域性的特点，单单依靠国际足联从内部解决已经很难根除弊病，必须采取全球治理的方式加以尝试解决。全球治理还强调行为主体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在全球层次上，治理一直被视为主要是政府间的关系，但现在它必须被理解为包括非政府组织、公民运动、跨国公司以及全球资本市场，它们均与影响力急剧扩大的全球大众媒体相互作用。" 为防范国际足球政治潜规则的发生，必须建立国际媒体机构、学术团体、国际奥林匹克组织、国际(区域)政府组织共同发挥作用的合作机制，尤其要结合非国家行为体灵活参与方式的优势以及国家行为体整合资源的优势，对政治潜规则进行多边式的治理。

2011 年 5 月 31 日，布拉特面对记者的诘难依然强硬："危机？你说什么危机？我们刚刚欣赏了一场精彩的欧冠决赛，足球没有危机。我们也没有陷入危机，只是遭遇了一些困难，这些都能在我们内部得到解决。"布拉特的反驳，在沃纳向记者展示的 FIFA 秘书长瓦尔克暗示哈曼通过贿选帮助卡塔尔获得世界杯举办权的邮件面前显得苍白，无论哈曼宣布退选还是被停职，国际足球政治的混乱依然没有结束。对国际体育的权力格局进行长期、深入研究的约翰•苏登与阿兰•汤林森指出："国际体育治理的变革并不是必然进行，但存在可能。体育治理是一种两极之间的平衡，这取决于全球变革与守旧治理之间的博弈。改革很有可能来自于不同因素的结合——内部变革的需要、外部的压力以及通过危机和瓦解带来的改变。"

《FIFA 黑幕》只是一本揭示国际足球政治黑幕的畅销书，批判性有余而建设性、学理性、前瞻性不足，然而一旦潜规则大白于天下，在外界压力和内部需求的双重作用下，未来的国际足球政治行为必然要走向补救、纠正、改革的道路，张吉龙担任亚足联执行主席一职未能够肃清哈曼留下的负面影响，但毕竟代表着在国际体育权力格局中争取话语权的中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与影响，可以通过参与制定游戏规则来改变混乱不堪的局面，这对国际足联的改革、对国际足球政治重新走向新的治理内稳态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契机。

参考文献：

[1] 王大骐. 安德鲁•詹宁斯 揭开国际足联黑幕[J]. 南方人物周刊，2010(16)：80-81.

[2] 安德鲁•詹宁斯. FIFA 黑幕：国际足联的贿赂、选票操纵与球票丑闻[M]. 徐天辰，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3] 颜强. FOUL！詹宁斯“淘粪精神”[N]. 金融时报：中文版，2008-05-21.

[4] 吴思.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M]. 修订版.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5] Vyv Simson，Andrew Jennings. The lord of the rings：power，money and drugs in the modern Olympics[M].London：Simon & Schuster，1992.

[6] 束锦. 当代中国选举中的竞争性研究——兼论“贿选”与“竞选”的制度性应对[J]. 探索，2007(2)：64.

[7] 李炳秀，陈晓春. 内部人控制与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探讨[J]. 云梦学刊，2005，26(2)：53.

[8] John Sugden，Alan Tomlinson. FIFA and the contest for world football：who rules the people’s game?[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8.

[9] Christiane Eisenberg. The development of a transna-tional soccer community in a changing global environ-ment[C]. German South African Lecture Series on Soc-cer，2010：112.

[10] 何丹翩 . 足坛腐败原因探究 [J]. 检察风云，2010(13)：14.

[11] 2022、2018 两届世界杯申办竞争激烈[N]. 参考消息，2009-02-04.

[12] 侯光明. 管理博弈论导论[M].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21.

[13] 国际体育组织已成黑金重灾区，非盈利性质迷惑大[N]. 中国青年报，2010-12-02.

[14] 国际足联堪称法律绝缘体，FIFA 果真是“非法”组织[N]. 钱江晚报，2011-05-12.

[15] 刘建银. 非营利组织营利活动及其收入的税法规制[J]. 中国行政管理，2011(1)：44.

[16] Daniel Howden. FIFA makes killing at South Af-rica’s expense [N]. ndependent，2010-06-10.

[17] 赵宏伟，郗永勤. 公共权力场潜规则的特征、成因及对策研究[J]. 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0，24(4)：72.

[18] BBC Panorama. Scripts of FIFA’s Dirty Secrets[EB/OL]. www.bbc.co.uk，2010-11-29.

[19] 吴柳林. 公共利益至上——从曝光国际足联丑闻事件看 BBC 的公信力体系[J]. 新闻记者，2011(2)：18.

[20] 俞可平. 全球化:全球治理[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3.



[21] FIFA' s historic contribution to INTERPOL in fight against match-fixing[EB/OL]. www.fifa.com，2011-05-09.

[22]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ur global neighborhood[M]. New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9.

[23] Lincoln Allison. The global politics of sport——The role of global institutions in sports[M]. London:Routledge，2005：42.

文章来自《体育学刊》2012 年 1 月刊。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郎效农：回归中国足协体制，充实中超联赛公司



中国足协原联赛部主任

“中国足球协会（以下简称中国足协）负责管理我国足球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赋予的法定职能和权利。但今天的中国足协早已是徒有虚名，实质上被在体育法上既无地位也无授权的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以下简称足管中心）取而代之。中国足球要扭转目前极其被动的局面，首要之举就是回归协会体制的管理。”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们以清人龚自珍的诗句，感叹今日的中国足坛似乎很是贴切。

赛场内外假赌黑的歪风邪气、权钱交易的腐败，使中国足球名声扫地；政绩为上的急功近利，颠倒本末，破坏了联赛和国家队的正常秩序；因循守旧和不求进取的足球思想和理念、日趋萎缩的青少年足球和弄虚作假的痼疾，使中国足球远远落后于国际足球发展的步伐，从成年到青少年在国际和亚洲赛场屡战屡败，每况愈下。二十年足球改革的成果、努力和理想被毁之殆尽。中国足球从改革初期的红红火火，到今天的惨淡萧条、欲说无语的境地，实在令人伤痛欲绝。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是当年龚自珍震聋发聩的呼唤。面对今天沉沦惨淡、哀近心死的中国足球，我们也已别无选择，唯有痛定思痛、绝地求生，彻底解放思想，义无反顾地学习和借鉴国际足球发展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及足球改革的实践，大开大阖，深化足球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技战术思想、职业联赛组织和青少年足球发展的改革，为中国足球的切实崛起和未来发展开拓出一条真正的希望之路。

千头万绪暂且不论，先就中国足球管理体制的问题谈谈一己之见。

一、我国的足球管理必须回归到中国足协体制



中国足球协会（以下简称中国足协）负责管理我国足球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赋予的法定职能和权利。但今天的中国足协早已是徒有虚名，实质上被在体育法上既无地位也无授权的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以下简称足管中心）取而代之。

足管中心是当年国务院精减各部委机构和人员时，国家体委从行政编制中精简和派生出来的众多事业单位编制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中之一。其开宗明义的职能是中国足协的常设办公机构，但其并不属中国足协设置和管理，其中心主任、副主任等由体育总局派遣任命，其部门设置、工作人员也均由体育总局列编，实质上是体育总局延伸的派出机构，拥有全面管理中国足球和中国足协的行政权利和职能。

足管中心主任办公会决策取代了中国足协会员代表大会决策，足管中心的工作部门取代了各个工作项目委员会……。本来应由各省市自治区、足球重点城市和地区、解放军及相关行业的足球协会的代表们，以民主协商、民主决策的方式确定的全国足球发展大计，现在却只由几名懂或不懂足球的中心正副主任们决定全中国足球的命运。本来应由各个项目委员会集体商讨和开展的各项工作，也被中心的各工作部门越俎代庖了。

这样的管理体制、这样的决策机制，既失去了代表性、的普遍性、科学性和权威性，也失去了民主协商、民主决策的程序，有悖于法制化、民主化的进程。这不但抑制了会员协会和社会足球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使其决策失误连连，怪招儿、昏招儿层出不穷。更为严重的是，行政权力的过分集中，使一些人无所不管、无所不能，为权力寻租和滋生腐败提供了土壤，现今几位涉案的足管中心官员正是这一体制的典型“受害者”。以行政管理的方式，管理业已高度社会化、市场化的足球运动，本来就不相适应。

中国足球要扭转目前极其被动的局面，首要之举就是回归协会体制的管理，按照我国体育法和国际足联章程、中国足协章程的规定，健全中国足协组织，完善各个委员会和工作部门机构，全面落实和履行决策和管理中国足球的职能。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使会员代表大会真正成为最高的决策机构，中国足协章程、中国足球发展的一切大计方针由他们制定和监督，会员代表大会四年一届，每年一次全体会议；执行委员会是在会员代表大会休会期间，在执行代表大会决议的规范下对重大或临时性问题进行决策；中国足协主席主持会员代表大会和执委会会议，保障会议依照章程进行和做出决议，没有超越会员代表大会及执委会自行决策的权力；项目委员会在会员代表大会决议的范围内，按照各自职能研讨和开展工作；秘书长负责管理常设办公机构，遵循会员代表大会、执委会的决议，并按照各项目委员会对应的内容，落实和开展各项日常工作。

依照体育法规定，国家体育总局主管全国体育工作。随着国家、社会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及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和政社分开原则的推进，其职能也由具体的微观管理向更高层次和



更加超脱的宏观管理转化。主要是依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党的相关方针政策，对中国足球运动和中国足协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协调、服务，确保中国足球健康有序的发展。

至于足管中心，肯定不应在保持现有的建制和职能。其可以经过精简改编回归体育总局，承担体育总局对中国足球指导、监督、协调、服务的具体职能。也可以在双向选择的基础上，将其人员保留在中国足协常设办公机构中的工作岗位。

由中国足协管理中国足球运动是遵循国际足联的规定和国际足球发展的共同规律，也是适应我国足球运动社会化、市场化发展的现实需要。它克服了足管中心的种种弊端，为中国足球的健康发展创造了必要的体制和机制条件。但任何体制和机制的运作都不可能完美无缺，社会不良风气及足球界内部的消极因素仍然会相互作用，从业者的境界和素质也会参差不齐，中国足协的管理体制也不可能杜绝所有问题，一些新的问题也可能出现。国家体育总局对其进行的切实的指导和监督尤为重要。

二、实现中超公司对中超联赛的全面管理

近来中国足球联赛的“管办分离”紧锣密鼓，几个方案颠来倒去大相径庭。最后推出了“理事会”案。

该方案集中国足协、二三十家会员协会、所有中超中甲俱乐部、中超联赛公司（以下简称中超公司）、社会专家代表，成立在中国足协管理下的职业联赛理事会，统合管理中超中甲两级联赛；理事会从各界代表中选出 15 人组成执行委员会；理事会设立执行局做为常设办公机构，执行局再设立若干分项管理的委员会或工作部门，执行局也负责指导中超公司运作；另外中国足协将从纪律委员会、裁判委员会、医学委员会中派出工作组，参与执行局的相关工作；中超公司除负责自身人员编制和运作费用外，还将额外承担理事会工作人员的编制、工资及理事会的相关费用。

坦率讲，这一方案给人的第一感觉，整个就是在中国足协内部设置的又一个小足协，甚至比足协还要繁琐复杂，看不出所谓“管办分离”的任何影子。首先是，理事会成员一大堆，各级管理者、经营者、智库、参赛俱乐部都是成员，身份、权益、诉求各不相同，分不清究竟谁是职业联赛的参与主体和足球市场的主体；其次是，如此“强大”的一个理事会并不具备法人资格，其实什么也做不了主；再者是，理事会机构设置更过于庞杂，叠床架屋层次繁琐，决策、执行可能都会更加复杂；还有就是，一个本身不具法人地位、也无行政所属或产权关系的“理事会”，却要指导企业法人的中超公司运作，还要中超公司给理事会工作人员列编和发放工资、承担庞杂的理事会的一切开销，这不但有悖公司法、违反国家财务制度，也给中超公司和做为股东的中超俱乐部带来了沉重的财务负担。



国际足联章程中明文规定，任何国家的联赛组织都必须在国家足协的领导之下。亚足联对各国职业联赛组织的要求也规定，必须是在国家足协领导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组织。无论是欧美足球发达国家，还是亚洲足球较为先进的日本、韩国等，他们的足球职业联赛组织都是具有法人资格的职业联盟。尽管他们在组织形式或结构上各有不同的特点和差别，但都是在国际足联或亚足联的上述规范下，由国家足协和所有参赛俱乐部两方面共同组成。

职业联盟在国家足协的授权下，组织、管理和经营职业联赛。一般设立全体会议、理事会或董事会、秘书处及工作部门。国家足协在联盟中拥有较大的决策权甚至一票否决权，但较少获取经营收入的分配甚或分文不取，使他们可以站在更加超脱的地位运用权力，保障国家足球的整体利益，促进联赛和俱乐部的发展，保障俱乐部之间权益的相对平衡。

这样的职业联盟，管办分明、成员简单，主体突出，责权明确，拥有独立自主的决策权，组织结构精简清晰，决策运作简捷流畅，财务成本节俭合理，促进了足球联赛和国家足球整体水平的积极发展。

职业联盟不是洪水猛兽，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联赛组织模式。其之所以风行国际足坛，自有其必然。

我们无须讨论“管办分离”这个见仁见智解释不一的词汇，只须建立一个符合国际足联和亚足联规定，管办清晰、成员简明、主体突出、责权明确、结构简单、运作便捷的组织。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中超公司，这是建立良好的职业联赛组织的重要基础，亚足联也曾多次建议我们在这一基础上整合中超联赛的组织。

中超联赛公司是由中国足协与 16 家中超俱乐部共同出资组建，在国家工商总局登记的企业法人组织。其组织结构是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经理层下设办公机构，实行股东会、董事会民主决策，董事会、经理层贯彻执行，监事会进行监督的法人治理。其法定的经营范围本身就包括组织和经营体育竞赛活动。其股权结构是中国足协出资 36%，16 家俱乐部出资 64%（每家 4%），中国足协以其超过 1/3 不足 2/3 的股权拥有对修改公司章程和变更公司性质或公司解体等重大问题的否决权，不拥有对选举和一般决议的否决权和单独通过权。公司利润分成为中国足协 10%，16 家俱乐部平分 90%。董事会由 8 人组成，中国足协 2 人、中超公司总经理 1 人、俱乐部 5 人，2/3 票数以上通过决议，董事长有由中国足协 1 人担任。监事会 5 人，中国足协 1 人、俱乐部 2 人、公司职工代表 2 人，监事会主席由俱乐部 1 人担任。

中超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成员简单、主体突出、股权清晰、责权明确、组织简明、运作流畅、成本低廉。尽管在实际运作中还存在着不少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但其体制、机制和组织形式，已与职业联盟颇多相似。



目前中国足协还存在一个中超委员会、一个中甲委员会，分别组织管理各自的联赛。原本已经决定和公布，在 2011 年将中超委员会组织管理中超联赛的职能转移至中超公司负责，以实现中超联赛的“管办分离”，为此中超公司还特别设立了竞赛管理部。但不知何种原因，这一宣布实际上并未兑现。现在中国足协南辕北辙地推出了新的“理事会”方案，将原已确定交由中超公司的管理中超联赛职能，又搬回了所谓的“职业联赛理事会”。

不知中国足协是否还是担心，怕将中超联赛交由中超公司管理后会脱离中国足协的领导。若此，完全没有必要，国际足联章程和亚足联的明确规定是基本的保障。环顾全球，又有哪一个国家的职业联盟脱离了国家足协的领导和管理。

我们真诚的希望中国足协能够抛弃一切不必要的疑虑，以改变中国足球落后状况的勇气和决心，授权中超公司全面负责组织管理中超联赛，健全完善相应的组织结构。以此建立起一个与其他任何国家相比都毫不逊色的联赛组织，使中超联赛和中国足球重新迈出坚实的步伐。

中国足球到了最危机的时刻，所有关心热爱中国足球、真心渴盼改变中国足球命运的人们，特别是足球运动的领导者、管理者和从业者，都必须以中国足球发展的大业为重，坚决抛弃官本位的思想观念、个人或小团体的私利，以切实深化足球改革的决心和行动，来开拓中国足球光明的未来。千万不要再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犹疑寡断。否则，中国足球的命运将更加积重难返。

文章来自共识网，原文来自作者博客。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一五一十周刊

主编：方可成

编辑：李佳凝

设计：池春荣，季文仪，林心怡

校订：李赞

出品人：杜婷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请发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若订阅 pdf 版请发送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mobi 版至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epub 版至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是在香港注册的非牟利团体，论坛理事杜婷、梁文道、闾丘露薇、周保松。除了一五一十周刊之外，Co-China 每月还在香港举办论坛，并透过网络进行视频、音频和文字直播。2012 年开始 Co-China 在香港举办面向青年的夏令营，第一届主题为「知识青年，公共参与」，2013 年夏令营的主题是「始于本土：本土、国家、世界冲撞与协商」。

Co-China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co

Co-China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http://weibo.com/1510weekly）

Co-China 论坛 facebook：「我在中國」（Co-China）論壇（https://www.facebook.com/CoChinaOnline）

